

炎黄春秋

8

1998

总第77期



1965年7月刘少奇在中南海

对刘少奇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再认识
三次思想解放 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我们对汪东兴这本书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读后
费孝通治学济世皓首不移
“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
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
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今年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百年诞辰，我们选登了几幅反映他生前的乡情、亲情、友情照片，以兹纪念。

1 1922年，刘少奇在安源

2 困难时期，刘少奇关心家乡群众疾苦，他第二次回到故乡

3 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亭亭

4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战友陈云、邓小平等在一起

炎黄春秋

春秋论

- 2 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再认识……余广人
8 “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杨明伟
14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孟凡
18 保卫四平之战……陈沂
27 三次思想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马立诚 凌志军

安然录

- 22 李立三是安源大罢工的直接领导者……李思慎
28 费孝通治学济世皓首不移……张彦 裴毓荪
32 毛泽东要“早鸭子”当海军司令……吴殿卿

凤凰鸣

- 34 君子章乃器……董秉弟
36 乡村建设实验家瞿菊农……谭重威

时代风

- 40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曾彦修
49 一个向蒋介石争来的苗族国大代表……陈浩望 周世伟
52 北大的校格与蔡元培的人格……靳树鹏

争鸣录

- 44 我们对汪东兴这本书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读后……何蜀 王年一

同心路

- 56 阳早、寒春——献身中国农业的美国人……武际良

宋玉成

- 60 安子介与香港《基本法》……吴跃农

人海录

- 64 国民党名市长吴国桢……孙宅巍
68 战火中驻使阿富汗……马行汉

古今谈

- 72 郑和墓的政治隐秘……倪泳 金陵客

古玩录

- 74 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官伟勋

文苑园

- 43 毛泽东批阅《红楼梦》……申春
59 “梁山伯、祝英台”本事考……浩望
78 姓名、家谱、谱牒文化……欧远方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庄 李普
李学勤 吴象 苏双碧
张镛 张国琦 凌云
常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青 戴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实 宋文茂(常务) 徐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渊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 徐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对刘少奇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的再认识

● 余广人

为新中国建设 蓝图的勾画提供依据

1951年3月，刘少奇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文，其中的第二条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

此后，虽然他并没有在哪篇文章或报告里再阐述这一口号，但这个口号的精神却始终贯彻在他的一些言论之中。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创立的科学理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

义，并具体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历史进入1948年后，毛泽东所预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大事。于是，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这段时间内，党中央开始比较集中地思考这一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党内多数人对城市工作不甚了解，而刘少奇由于曾经长期领导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对城市工作和城市工商业的了解则相对多一些。这种经历，使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因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报告之中，即1948年9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和随后的12月25日在华北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驾驭“新中国航船”的舵手们，虽然对已在东方地平线露出的社会主义曙光欢呼雀跃，但是他们很明白，由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过渡到彼岸的航程中，还无法马上采取很多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

那时，赖以支持新中国发展的国民经济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占领导成分的国营经济，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小；而小私有经济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占了绝对的优势。在这种局面下，解决好汪洋大海似的小私有经济，正确地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转化，是保证向社会主义彼岸顺利航行的重要—环。这一环节，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

这一环节的确立，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它的刘少奇，起着总领全局的作用。

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所作的《新中国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

在这两篇报告中，刘少奇所表达的中心观点就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步骤。他几次强调指出：“共产党人要看前途，要有清醒的头脑，同时又要严格指出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

同时，刘少奇在报告中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矛盾和党的斗争策略作了比较系统地阐述。他指出：“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穿串在各个方面，是和平的竞争。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

当时，刘少奇报告中所阐述的理论，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思考是一致的。他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时，毛泽东曾几次插话，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在刘少奇讲到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时，毛泽东特别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刘少奇讲到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顶多占10-20%”时，毛泽东补充说道：“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产量顶多占10-20%，光是国营经济还不会有这么多。”刘少奇随即赞成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

毛泽东还在总结发言里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少奇草拟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



刘少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刘少奇的上述主张，为这次为解放南半个中国和勾画新中国建设蓝图的会议制定了正确的经济方针，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报告，也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

天津之行：为新民主主义建设铺路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在西柏坡的工作，迁往古都北平。

毛泽东、刘少奇等五大书记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刚安顿下十多天，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就火急火燎地给中央发来了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的中心意思，就是向中央请示如何开展城市工作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人民解放战争也进入了最后的胜利阶段，一大批城市陆续解放。七届二中全会虽然定下了接管城市的总的方针，但是如何使接管下来的城市生活正常运转，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迅速恢复私营企业的生产，便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当时，身为华北局书记的薄一

波，参加了北平、天津两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因而对这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有深切的体会。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了天津的情况：由于天津解放后，没有及时宣布有关工商业和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法令，资本家普遍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他们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表现消极，有的甚至想弃厂外逃。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不足30%。薄一波迫切要求中央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向工人、干部、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的疑惧心理。

对于薄一波的两个报告，毛泽东、刘少奇极为重视。刘少奇认为，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然这种存在和发展，必须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天津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4月10日到达天津，他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向各界人士阐述了党的城市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讲话中，他批评了干部中“左”的倾向，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天的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5月2日，他在天津市政府交际处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向他们解释共产党政府的政策，说：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有个资本家说：“现在我们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点残羹余

汤。”刘少奇回答说：“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

有些资本家反映很不愿意听到“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刘少奇笑着说：“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

“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刘少奇的一席话，揭开了蒙在资本家心头的阴影。东亚公司总经理宋棐卿很快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并写信向他作了汇报。为表示鼓励，刘少奇给他回了信：“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的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刘少奇的一系列讲话，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是密切相联系的，也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薄一波把刘少奇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毛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不一定这么讲。毛概括了十六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的科学概括很重视，他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这就是我党实行“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由来。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还体现了他以前就很重视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倾向问题。早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曾提醒全党，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问题，“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5月5日，他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强调，反“左”要比反右要困难得多。他说：

“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东西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最近东亚毛织厂的资本家宋棐卿写信给我，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我也回了他一信，好象我是替资本家打算的。但是假如另开了一个新工厂，使原有的一千多工人增加到两千多工人，岂不解决了很多工人失业问题？所以只好和资本家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时失掉了立

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且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拉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了。关系极好，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了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这种人大概立场不稳，一接头就投降了资本家。共产党人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

刘少奇的反左比反右更难的观点，世事沧桑五十年，至今仍让人生出诸多的感叹。

现今，人们已经知道，刘少奇在文革中所得到的的一条所谓的“罪状”——“工贼”，即是由此演变而来，但那已是近二十年以后的事了。事实上，在刘少奇讲话的五年后，党内就发生过一次反对刘少奇的风波。

这场风波的挑起者，是当时的东北局书记高岗和为其推波助澜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起因是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而隐藏在深处的原因则是，刘少奇对山西土改的方针政策与毛的分歧以及毛对刘“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给高、饶提供了可乘之机。

毛、刘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的分歧

土地改革的工作，在中央领导中历来是由刘少奇分管。1950年初，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确定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同年的6月6日，刘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债务、人民法庭等方面的政策，得到了全会的通过，全会并决定成立以刘负责的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

作。稍后的6月14日至23日，在以讨论土改问题为中心议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刘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并就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全会作了说明。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两个文件。7月下旬，刘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8月经政务院通过后颁布实行。这一系列文件的制定，使解放区的土改轰轰烈烈地进行。到1952年冬1953年春，全国已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全国土改工作也基本完成。

土改以后，我国的个体农业要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劳动互助的形式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党内的领导同志取得了一致的共识。但是，在对农村基本中农化以后是否应当允许少数富裕中农冒尖以及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党内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刘少奇主张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应该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不要急急忙忙组织集体生产。1950年1月23日，他在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话时提出，东北应该让“三马一犁”式的农户大量发展，允许农民（包括党员）农民单干、雇工，要防止在向集体生产过渡问题上犯急性病。但是毛则对刘持不同意见，两人产生了歧义。这歧义集中地体现在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上。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其中说：在山西老解放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

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根本原因。”省委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制是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是应当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报告送到华北局后，薄一波、刘澜涛等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请示刘少奇。刘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刘的意见，5月4日，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作了批复：省委“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提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目前“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制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刘少奇在接到华北局批转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听取华北局领导的汇报后，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几次提出了批评。

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上作报告，在讲到经济问题时，他说：“在3年准备（还有16个月）之后，我们来一个10年计划。到10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那时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农业，而且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据此他指出：“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

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

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的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这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指出：“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步骤——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报告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这五种经济都会有发展，它们的基本关系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发展的结果，工业比重要逐渐增大，农业比重要相对缩

小。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这段时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然后才能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两个主要步骤，进入社会主义。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态度才能决定。”“工业国有化不是逐步实行的，而是逐步准备好的，当作一种严重步骤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乡村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和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依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一方面，是农村中广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思想、富农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互助组、合作社，国家贸易与对富农的累进税，并且还可以有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这样两种潮流要同时在农村中发展和斗争。最后，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吸引农民到集体经济中来，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在农村中既不是去阻止或企图避免农民的自发势力，也不是让其自流，而要加以领导，适当的控制和限制，准备最后的胜利。”报告中又一次对山西省委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意见。

7月25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对报告作了许多修改。但是，随后，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的理由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厂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

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因此，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决议。

毛、刘关于山西省委报告的争论到此本应画上一个句号，但是由于高岗的介入，使毛对这场争论有了新的认识，并进而开始了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

盲目急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成为靶子

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毛泽东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农村，在土改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发展生产的运动，农村经济获得了普遍的上升。报告将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原因归结为：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报告在列举了合作互助组的三点作用后，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

10月17日，毛泽东将此件批给了刘少奇等人，并嘱杨尚昆印成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委党委，同时发给各中央部门党组，此次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还亲自起草了一个批语：“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

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毛的这种做法，显然含有与刘少奇及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报告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意味。批语虽然还有一句“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但是，批语充分肯定这一组织并要求继续发展的想法，已溢于言表。因此，这个批语多半可以看作是党在指导思想产生急于过渡情绪的信号。

稍后，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交报告称：该省今年互助组已由6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并有22个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合作组织已成为生产运动的中坚力量，11月21日，毛为这一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认为河北的经验可以在各地广泛实行。12月15日，毛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九月会议草拟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施，把农业互助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

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占65%以上，新区占25%，不仅如此，全国还出现了40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十几个集体农庄（即高级社）。与这种形势的发展相比较，刘少奇所倡导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则显得有些右倾保守了。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同时，对刘所倡导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提出了公开的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

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他指责“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有害的”提法和“右倾”的观点，认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的“走向”二字，只是走向而已，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

8月12日，毛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在对“新税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再一次翻出了1951年的“老账”²——围绕山西省委报告的争论，对把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走到集体化的道路，看成“是一种空想”的观点同样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毛的讲话，给一直想成为毛的“助手”的高岗提供了可乘之机。高岗在这次会议上，借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批薄射刘”。他公开宣称：“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因此，他的发言拙劣，把刘少奇的一些观点，如1949年的天津讲话、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语等，统统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以暗示刘少奇犯有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推波助澜，把矛头对准刘少奇。

对高、饶的一系列不正常的举动，毛泽东察觉他们另有所图，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了高、饶的问题。毛在会上指出，高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

在随后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在揭露高、饶问题的同时，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虽然毛在安排刘作这个自我批评时很客气地写道：“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但是，毛这一举动，实际上是确认了刘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犯有“右”的错误。

围绕着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

义制度”的不适当的批判，反映了党内开始滋长着一种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不但把土改后党关于“确保私有”和“四大自由”的政策，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当作资本主义观点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而且，在合作化问题上也开始产生贪多图大的思想苗头。到1955年的夏天的批邓子恢、反右倾，这种急躁的情绪更是不可遏制，合作化运动中的“左”的倾向也愈演愈烈，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严重偏差。此后，中央虽有几次纠“左”的努力，但都难以遏制盲目求纯，急于过渡的偏差。这些失误，在今天看来，与批判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失误，不能否认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对于刘少奇而言，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不适当的批判，以及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所留下的空白，后来给刘少奇本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恶果：十几年后的“文革”，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雄文”，大肆攻击刘的“天津讲话”诬蔑刘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其所藉起还是高岗当年向刘掷出的“炮弹”；此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竟然被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由林彪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之中，使堂堂的共和国主席竟然背着“叛徒、内奸、工贼”莫须有的罪状隐姓埋名地沉冤而去。历史给后人开了一个悲枪的玩笑！

在纪念刘少奇诞辰百周年的日子里，想一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想一想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尤其会感受到这悲枪的沉重。走笔至此，一位哲人的话又滑落耳旁：“一个人的悲剧，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以阶级斗争为纲” 错误口号的由来

● 杨明伟

从1962年秋天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总纲领。

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八届十中全会是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的会议。党内尤其是处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在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困难时期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为党的工作铺设了一条“阶级斗争”的附线。1962年5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这的确是周恩来“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的一贯作风。早在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

话，反对说假话。”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

然而，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主张把困难的严重性向人民讲透的作法，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了。

应该说，经过“大跃进”等违背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建设运动后，人们充分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没有完全现成的道路可以遵循。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心中，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只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必须独立思考。

周恩来曾经说过：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遗憾的是，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为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以便对严重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局势施行大手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毛泽东不在北京，但这次会议，是征得

毛泽东同意的。

周恩来在11日的会议上解释了“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为此，周恩来对国家的精简方案作了详尽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安置职工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并作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讲话，他说：

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刘少奇还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还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才能挺起腰杆前进。事情还不是漆黑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实事求是加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书房

以分析。”

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会议做出的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同意周恩来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措施。

毛泽东不满意的是，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的调子太低。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总体上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心中很不愉快。

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陈云和邓小平、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6月底，陈云向周恩来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支持陈云等人的主张。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还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可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等想法。

然而，在农村私有部分所占比例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想法是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不同的。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

和政治渊源,必须在中央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进行解决。

7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7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写明,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这几大问题涉及的工作,正是周恩来主管的工作。因此,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作动员报告时,就是根据上述问题交待调查任务的。

这批调查组的组织,是为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吃机动粮的情况,由周恩来提议,中央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100多人组成的,共分45个分组,分布到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查。这也是周恩来为配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使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会议推迟到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

这期间,周恩来参加讨论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解决上述迫切问题的相关文件。

到7月下旬,中共中央预定利用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基本筹备就绪。7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完有关精简问题的会议后,前往北戴河。他要带到北戴河的议题,仍然是精简、粮食、城市工作等等。

周恩来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接领导中央工作会议的重大事宜。为开好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分为6个大组和若干小组。还专门成立了会议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各口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组成。

对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周恩来仍在照着原先的工作安排进行工作。

7月28日、29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北戴河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准备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关于粮食问

题的报告(修改稿)》。这份修改稿说:要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必须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外,还必须在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在兼顾城乡人民生活的原则下,继续适当地减轻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并且把它在一定水平上固定一个时期。这是粮食工作方面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方针性的问题。

修改稿中在总的大原则下,溶入了个人利益的原则。这是很难得的,也算是在当时单一的集体经济情况下的一种突破。

7月30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开始召集有25人参加的城市工作会议,着力解决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至8月24日止,他共主持召开了17次这样的会议,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稿。会议期间,周恩来明显地感到,解决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决非易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像他8月1日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说:解决城市工作中的问题的办法首先是恢复正常生产。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援了农业和市场以后,生活才会改善。

其间,周恩来又多次主持解决粮食等问题的会议。繁重的工作,使周恩来在北戴河这一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休息,会议期间他反而积劳成疾。

正当周恩来的体质逐渐下降的时候,8月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在北戴河拉开了帷幕。

在这天的大会上,毛泽东一讲话便突如其来地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阶级: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毛泽东说: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

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形势：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是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问题一提出来，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提的这三个问题是

有感而发，有针对性而来的！

人们不得不迅速思考！没有人敢不认真地思考！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与会者越听越感觉到毛泽东的矛头所向：

——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一股“黑暗风”；

——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是一股“单干风”；

——彭德怀等人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这一行动是一股“翻案风”。

毛泽东的这三个问题一提出，出席会议的各中央委员们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阶级斗争问题越发显得重要，会议将要重点讨论它，而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已经受到冲击。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主要讲的是计划问题和农村形势问题。但是，他在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问题时，也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表态说：

毛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五个矛盾，很尖锐、重要和适时，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照样还会有阶级斗争；形势一改变，我们的同志就模糊了，以为搞了几十年，还讲什么阶级斗争长期性，讲什么阶级。

周恩来的这段话，是迎着毛泽东的意思说的，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周恩来还说：

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单干的问题，农民过去主要是单干，但是现在主张单干的不多；包产到户要分清界限，不都是单干，有些取得成绩也是主要的；农村形势，虽然我们一开始把困难估计得多了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我们的困难问题并不是漆黑一团。

而周恩来的这段话，却有些辩解的成分。他不太同意毛泽东对“单干风”和“黑暗风”的批评。

8月11日至15日，周恩来大病了一场。15日以后他继续出席会议。而这期间，毛泽东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讲话更加坚决。

8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心小组会议，并再次对阶级斗争问题发表看法。他首先表示，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而对农村单干和责任田问题，他则提出要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要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讲到对形势的看法时，他既承认了认识上的错误，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对形势估计，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更多了一些，这对党内产生了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但也有相反的，如有许多老工人听了讲困难，要留厂，不要退职金，表示决心和信心更大，愿意共同度过困难。”

他还说，对待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悲观失望，一片黑暗。

周恩来的话中，显然是赞扬前一种态度。但他的这种辩解态度，毛泽东未必同意。

在以后的会议中，周恩来接着抓他的城市工作、粮食工作、精简工作和计划工作等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

到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形势有了一种新的说法：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情况一天一天好转。

8月25日，周恩来到北京。一方面进一步抓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迎接党的另一次重要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

经过北戴河会议的思想准备和8月26日至9月23日的预备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

东正式在中央全会上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

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认为，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所以，对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从现在起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党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全党对于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9月2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说：

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比如，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这对

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同困难作斗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他态度明确地说：

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要吸取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不搞运动。机不可失，要团结全党，抓紧工作。

所幸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也记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表态：

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可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时间要做工作。

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毛泽东警惕地盯着阶级斗争的动向，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

不幸的是——阶级斗争开始成为经济工作一条不可动摇的附线，从此与经济工作扭缠在一起。这正符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交待的：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但要跟调整工作平行，要有人去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谁来对付呢？有人。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以他那惯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眼光瞄准了李建彤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提出这是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在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他们是一个“反党集团”。毛泽东同意康生的意见，并在会上给人们重重地敲了一下警钟：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搞反党行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把一些有关阶级斗争的材料批给江青、陈伯达等人看。

1962年9月29日，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最醒目的位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写入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耐人寻味地指出：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从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中共中央对全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号召！

到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面上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大的方针上开始跃居“以生产为中心”之前。一场全国性的政治上的不幸，开始悄悄地袭来……

(责任编辑：致中)

更正

本刊1998年第6期19页倒数第二段关于黄河复归故道的时间有误。应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2月设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1947年3月15日堵口工程合龙。从此滔滔黄水复归故道。”

编辑部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 孟 凡

1977年—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下面就我在理研室和《理论动态》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做一些简要的回顾。

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禁锢， 胡耀邦站在思想解放最前列

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点燃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后来他又多次表明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5月，当胡耀邦和《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时，邓小平鲜明而坚决地表示对这一讨论的支持，说《理论动态》是好班子，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正是小平同志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抓住全党全国最紧迫的决定性环节，做出了战略决断。而耀邦同志则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站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的冲锋陷阵的勇士。

胡耀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走上党校领

导岗位的（中共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以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抓了几件可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的大事：

第一、把学风建设放在首位。1977年6月4日，耀邦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这里所讲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抓党校的复校工作的。

第二、在耀邦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揭开康生问题的盖子。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康生在中央党校扶植的领导班子还在台上，上面还有人保，要揭发康生，也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当中央党校一些同志给康生贴小字报时，耀邦说：“既不提倡，也不禁止。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通过在校学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播到全国，形成势不可挡之势。后来中央党校揭批查办公室整理了群众揭发的康生材料，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导致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处理。

第三、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率先吹起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号角。在校内揭、批、查的基础上，耀邦亲自领导着手平反党校的冤假错案，首先是为被康生、陈伯达等人打成‘反动组织’涉及几百人的一个群众组织平了反，进而为50年代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

99名学员和工作人员平了反。这两件事在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杨逢春、叶扬、陈中的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此文是耀邦同志亲自策划指导，根据他的谈话精神写成初稿，前后修改达17次（《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加了修改）才定稿。

第四、耀邦同志倡议并亲自指导创办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并把它作为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发行主要对象是地级以上干部，后来扩大到基层。《理论动态》创刊后，由于注意抓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敢于破除迷信，说真话，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老同志反映尤为强烈，发行量剧增。很多重要文章，先后被中央各报以“特约评论员”“本报评论员”“社论”名义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

第五、在中央党校教学中，耀邦同志最早提出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了过去十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1977年9月22日，耀邦同志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汇报时就明确提出，党史要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当文章发表也可以”。后来他布置成立一个组（吴江任组长，缪楚黄，周逸任副组长），提议先搞出个方案来。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年1月中旬，小组根据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写出初稿，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文化大革命’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当时对“文



胡耀邦与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

化大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才改变了对“文革”的看法）。胡耀邦12月26日对这个提要作了批示：“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之后，编写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对这个提纲又作了充实和修改，在吴江主持下邀请部分学员代表座谈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把写成的二稿，在“党的学说”的10天课程中发给学员阅读、讨论。这样不仅使学员初步掌握了真理标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而且经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第六、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耀邦同志就组织了两篇明确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第一篇是邵华泽所写的《文风与认识路线》（《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转载。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并联系实际加以阐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所以胡耀邦非常重视，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文风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邦’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

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可组织一系列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孙长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划掉‘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此文是较早（1978年初）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立足点也比较高。1978年4月孙长江应邀去《光明日报》参加对胡福明的文章修改时，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与胡福明文章、“捏”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都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它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

耀邦同志对“实”文的定稿和发表起了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一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不仅提出来，而且党校复校后在教学中，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都积极地加以贯彻。他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以真理标准问题为突破口，组织写了一系列文章。所以他批准“实”文的发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他对理研室两次排印的“实”文送审清样，不仅迅速批准，而且5月6日还专门召开动态组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我参加），再次对文稿做了认真的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表示了对这件事严肃的高度负责精神。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理论界、新闻界协同行动（重要文章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新华社发通稿）的方法，并指定我多做这方面的协调、组织、沟通工作，强调这是值得提倡的好方法。《理论动态》很多重要文章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和作

用。以新华社为例，从1978年以来，差不多半个月就开一次“理论动态”与“新华社国内部”的碰头会（由我与王聚武或吴振坤及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参加，后来由李峰参加），互通情报，议论选题。这一不成文的制度，在我在职时就坚持了五年，碰头达百次以上。我们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编译局、国家科委、中组部研究室等也经常保持着这样的联系。有的由耀邦同志主持开会，共同参加，共同商定选题。文章写成后，又共同参与修改，搜集反映。这种平等协商、集思广益的方法是耀邦同志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方法，所以得到耀邦同志充分的肯定。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不只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的文章。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按照总体设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打歼灭战”。

“实”文发表后，耀邦同志一时处境艰难，已不可能实现他组织第二篇重点文章的设想，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继续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他采取曲折方法处理，在吴江同志把他所写（孙长江协助）《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同时送给《解放军报》和耀邦时，他不仅同意文章的观点，而且派他的秘书梁金泉送罗瑞卿同志，他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罗大将说要发，在那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望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我们这个（刊物）不行了。”（沈宝祥访梁金泉记录，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做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耀邦同志说他没有参加，实际上却参加了，此文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同志共同商量过的。《原则》一文的发表是针对所谓“砍旗”的指责的一次正面回答，这也是

耀邦同志在罗大将的支持下所进行的一次“曲折”斗争的胜利。“原则”一文《解放军报》以本报评论员文章名义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刊登,新华社发了通稿,反映强烈,起到“重型炮弹”的作用。另一篇文章是《‘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韩树英撰写),《理论动态》第73期(1978年7月15日)发表,《光明日报》7月23日转载。这篇文章触及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发表后反映强烈,认为是“实”文的姊妹篇,有不少人因为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也得到平反。这篇耀邦同志从初稿到定稿都倾注了不少精力,题目也改动过三次。第三篇文章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动态》第84期(1978年9月10日发表,王聚武撰稿),《人民日报》于9月25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于9月26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许多地方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主要是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展到实际工作领域,强调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这篇文章从选题的酝酿到撰写、讨论、定稿先后经历了一个多月。耀邦与理论动态组先后作过三次谈话,对初稿、二稿都做了修改和写了批语,9月4日对初稿的批语是“总的说很不错,改了一点,还要加一段,长点没有关系。”定稿后,排出清样送审后,又写了批语:“改了一点,我认为是近一个月来最好的一篇,请再斟酌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有三次变动,耀邦同志最初出的题目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讨论最后才确定用《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另外,根据耀邦同志的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展到各条战线的设想,《理论动态》还组织了一系列党风和党建、民主和法制、市场经济与经济建设、科技文教、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理论探讨和指导思想及拨乱反正的系列文章。例如《理论动态》第160期

(1979年9月30日),发表的《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的目的》(吴振坤撰写)就是在耀邦同志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在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广泛重视,舆论界认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化,并由此引发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耀邦同志强调《理论动态》必须在办刊指导思想适应这一转变。他说:“《理论动态》如何更好地前进?这要从分析形势说起,三中全会前,理论思想界的任务主要是拨乱反正,破的多,这是对的,现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搞。今后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四个字:‘扬帆远征’。重点转移,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帆扬起来,还有拨乱反正的任务;但侧重点是研究新问题,思想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要在扬帆远征中走在前面。”(1979年5月3日与《理论动态》组的谈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表示:“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他根据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越来越重要”。耀邦同志在给《理论动态》的一张字条上写道:“新题目”思想路线:1. 每个干部都要有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参考邓副主席讲话),2. 怎样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3. 脱离群众和思想僵化。阶级斗争。请多想几个题分开写”。《理论动态》在1978年12月15日以后发表的系列文章和《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第103期)、《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第104期)、《伟大的实践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第105期)、《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第119期)、《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132期),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撰写的。

以上情况说明,耀邦同志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作出了其他人不能比拟的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致中)

保卫四平之战

● 陈 沂

四平保卫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是一个重要的战役，该不该打，至今有人还在议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央先后调集了10万部队，2万干部，20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中4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赶赴东北，比国民党抢先了一步。而当时已是苏军解放的东北，这给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一些便利条件。但我们面临的是国民党开到东北的五个军，全部是美械装备，有相当的战斗力的。还有中苏条约的制约，驻东北苏军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当时东北的群众根本未发动，正统观念还比较浓厚。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又是来自各个根据地，虽然在发展东北这一点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在思想、作风、战斗和工作方法上则不完全一致。有些人没有树立建立根据地思想，对和平抱有幻想，想单纯依靠大城市和苏军的支持来夺取东北。

我们要努力发展东北，甚至提出要独占东北，而国民党则要同我们争夺东北，完全占领东北。东北的斗争必然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这时，东北剿总杜聿明已率军占领锦州、沈阳，正继续沿中长路北进四平、长春，企图进一步攻占哈尔滨。

1946年3月6日至8日，中共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了会议，讨论了东北形势和作战的指导

方针以及根据地的问题。总的说，会议对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到会议结束，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的做得较好，有的则做得差点，还没有真正进入发动群众的运动。这形势对我军的作战是极为不利的。作战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战前，无人支前运输，仗打完了，伤兵没有人抬。部队还是处于一种无根据地作战的状况。

据参加四平保卫战的同志回忆，不论是中共东北局或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战前都没有说或者计划过要来一个四平保卫战。四平保卫战是逐渐形成的，照当时林彪的说法，是“且战且退”以阻击敌人，迟缓敌人的进攻，给后方以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间。

4月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出关于保卫四平的指示，认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8日又电示：要求坚决保卫四平。我军于4月16日在八面城以南，开始四平外围作战，抓住战机，在金山堡、大洼地区消灭了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七师。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消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除师长逃掉外，几乎是全歼。

消灭了敌人一个美械装备的师，打乱了敌人进攻四平、长春的部署，从而使沿中长路进攻四平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不能不考虑下一步怎么行动。此时新一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我军的节节阻击，伤亡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孙立人离开了新一军，由郑洞国以副长官的名义代替指挥，进一步组织进攻四平。虽然进攻有些进展，最后进至四平城下，然而仍是攻不进去，四平街还是只能在他的望远镜视距之内。

敌人屡攻不克，形成对峙局面，四平前线一时比较平静了。“前总”考虑我军至少可以在四平周围休整一个相当时期，同时，可以给后方各地以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间。经东北局批准，“前总”成立了野战政治部，任命我为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创办《自卫报》，在总部驻地梨树召开进军东北以来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上林彪专门讲了东北当时的战争形势，指出：“在东北，当前肯定没有和平，和平是打出来的。只有打得敌人知难而退，才能实现和平。”他要求全军，要立足于打，不要存在任何和平幻想。他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是略略好了一点，敌人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时间，使我们能在四平街守下来，我们决不能就因此产生错觉，敌人新的进攻还会到来的。如果我们能在四平城下继续顶住，也能像金山堡、大洼战斗那样在野战中继续消灭敌人，我们这个喘息的机会就会更长，后方的群众就会更快更好地发动起来。那时我们就有一个像样的根据地，仗就会更好打了，和平也许就会早一些到来。当前，最重要的是，决不要为国民党的和平触角所麻痹，这纯粹是他们的一种缓兵之计，只要南满他们一抽出手，四平前线更大的战斗就会爆发起来。

“前总”作战处根据会议精神，对四平城内防守，要求继续加强工事，培养战士的战斗韧性……发挥猛打、猛攻、猛追、猛退的精神。

这次政工会之后，我们继续进行形势教育，进行俘虏政策教育，加强驻地的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我军是东北人民的军队，做好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工作。为使敌人了解我军的各项政策，对俘虏要抓一个放一个，我们当即释



陈沂

放了一个国民党七十一军的团长。

这时长春已经解放，东北局已由梅河口迁到长春。东北局派文工团来前线作慰问演出，辽西区行署主任朱其文亲率慰问团来前线慰问；辽西省委、省军区陶铸、邓华抽选了一些地方武装前来补充主力部队，大大鼓舞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这时新华社也开始播发四平前线的战况。消息传到延安，党中央4月28日发来电报：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4月29日，东北局也以林彪、彭真、罗荣桓3位首长的名义通令嘉奖保卫四平的有功将士，嘉奖令如下：

英勇保卫四平的将士们：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于攻占山海关、夺取沈阳之后，节节进逼，我

军忍无可忍，已于四平展开壮烈保卫战，阻止反动派军队之进攻。你们在接受与执行这一任务上果断、坚决，奋不顾身，使四平的保卫战已进入第12天，粉碎了顽军无数次的猛攻，杀伤顽军3000余众。顽军虽然集中飞机、大炮向你们袭击，但竟不能动摇你们分毫，这本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色，也是你们忠诚为东北人民服务的崇高表现，更是我们争取东北和平早日实现的必经阶段。

这里，特向你们致敬。并令全军、全线策应你们，支援你们！尚望你们继续发挥过去12天保卫战的英勇精神，与四平10万市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勿因疲劳而松懈，勿因胜利而轻敌。尽量争取化四平为马德里，把进攻的顽军埋葬在四平。

5月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给林彪指示：

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面同意的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中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

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连续给林彪、彭真发出指示，要求坚决保卫四平。

我今天手头还保存的东北民主联军野战政治部出版的《自卫报》上刊载的部分材料。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和东北局对保卫四平的态度。实质上，是要像马德里那样，用更大的代价来换取“和平民主新阶段”。“保卫马德里”是中央提出的，东北局接受这个口号，提出“尽量争取化四平为马德里”。事实上是在四平进行了这么一场大战斗，一场影响东北整个战争形势的大战斗。从我个人的回忆，“且战且退”始终是占据着我的思想，影响着野政的工作，就是林彪本人，当时也没有准备要在四平进行一场死打硬拼的大战役，我们全军上下都觉得“且战且退”，相机歼敌的打法是合算的。

由于我以逸待劳，保卫四平的胜利越来越大，“前总”估计杜聿明这时有可能把新六军调来，加入进攻四平的行列，因此，“前总”决定要三纵由南满开到四平的右翼阻击新六军北上增援四平。同时又令解放长春的七师，开赴四平前线参战，远在后方的三五九旅也奉命开来四平前线增援，以防敌人封闭我军的退路。

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情况没有特殊变化，前总决定是要在四平街顶下去的。我到前线去看过，由于部队得到这段时间的休整，情绪稳定，求战心切。战区的群众得到发动，支援战争的热情给了部队巨大的鼓舞，部队都有决心为保卫四平而战。

正面进攻四平前线的新一军，在郑洞国的率领下，他们虽然依仗他们的美械装备，占领了四平西南角的一幢红房子，算是攻进了四平一点点，但整个四平城区，还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郑洞国此时进退维谷，只好构筑工事，这样旷日持久，不仅杜聿明安心不下，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不断来电催促，他一方面要杜聿明调兵加速对四平的进攻，另一方面利用军调部向我方伸出和平触角，提出：“哈尔滨共管，长春、沈阳归国民党”。这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我们“就地还钱”。也提出：“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我们。”

这时我们从空中情报（敌人的无线电讯）得知，新六军已出动，第七十一军、第五十二军，也作为预备队加入进攻四平的战斗序列。“前总”预计四平将面临一场大的战斗，电令三纵，马上进入昌图、开原一带拦截新六军，还调七纵进入塔子山阵地，新四军七旅、山东七师进入三道林子北山阵地。山东一师、二师和新四军三师的其他部队留在四平以西、八面城南北，以阻击七十一军。

这时敌人新一军继续沿中长路直扑四平，新六军往东边急进，迂回四平，进而占领西丰和四（平）梅（河口）路上的平岗车站和哈福车站，进而进攻塔子山和三道林子，堵截和封闭我军北撤的退路。第七十一军则由郑家屯、八面城方向迂回四平，逼近我“前总”所在地——梨树。

战局的关键部位在三纵那里。三纵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以不少杀伤，但三纵没有估计到，新六军有着美械装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们机械化运输的优势，他们避实就虚，以小部队和我三纵部队在阵地上厮杀胶着，大部队却用600辆汽车装运迂回侧后，途中遇着道路翻浆，他们铺上钢板强行通过。等我军发觉用炮火拦击已来不及了。这样，新六军主力很快就冲破了我三纵的防线，进入四平右侧，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直扑塔子山和三道林子。

这里我军战斗十分激烈，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使敌人尸横遍野，几乎每一阵地都是与阵地共存亡，战至最后一人。

此时此刻，不能不考虑全线撤退了，林彪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这之前，林彪向秘书作了口述命令：“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他就得到三纵的电报：“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6时进占哈福站。”林彪立即又向秘书口述命令：“再命塔子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情况确是万分紧张了，林彪把我和陈正人（后方总政主任）叫去，要我们草拟四平撤退告全军的电报，他给我们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守城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然后他又继续说：“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特别是我们的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他立即把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叫来，交待了下一步：

“七师于三道林子北山，七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线撤退。”

最后，他亲自拟了个电报，把这个情况和决定报告了毛泽东和东北局，并得到批准。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结束了。这一战役歼敌1万6千余人，我军亦付出15000余人的代价。这对当时，仅有28万人的民主联军，是个不小的数字。

在撤退中，虽然遇到了这种、那种困难，但

主力保存了下来，还保有一定的旺盛的士气，并成为尔后发展东北、建设东北，实行反攻的骨干力量。

此时，敌人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又在海城起义，直接威胁了敌人的后方。敌人也感到占的地方过多，交通线太长，兵力分散，顾不过来。所以敌人虽然攻下了四平，占领了长春、吉林，却没有敢直趋哈尔滨。有没有哈尔滨，对尔后发展东北、建设东北，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当时都有其重大意义。

回想四平保卫战，给我们最大的教益就是把我们的和平幻想彻底打掉了，当我们从这场保卫战中觉醒过来，深深体会到，没有根据地的作战是水上浮萍，是不能战胜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重温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并贯彻执行，就会产生无穷尽的力量，既促成了东北局改组和产生的“七·七”决议，又为以后执行“七·七”决议奠定了胜利基础。

（责任编辑：刘家驹）



四平烈士纪念馆

李立三

安源大罢工的直接领导者

● 李思慎

1922年9月，安源发生了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是，这次大罢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是主要直接领导者？过去由于政治的偏见，使这段工运史长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反映。一些史学工作者，不顾历史的真伪，极不严肃地采用“换头术”，把本来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其他人的身上。1963年夏，电影《燎原》正式上演之前，《北京日报》社记者约李立三写影评，被多年政治路线问题困扰的李立三，不得不违心地写了一篇《看了“燎原”以后》，发表在6月4日的《北京日报》上。之后，李富春还批评，说是文章对毛主席突出不够。不得已，李立三在原文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内容，再刊登于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人又把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流传了几十年的民歌歌词“有个能人李能至（李立三）”篡改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说成是什么“贯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安源成为李立三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禁区。他自1923年4月

离开后，再也不敢涉足安源了。即使1954年他回到故乡醴陵探亲，对近在咫尺的安源，也只能“却步”。

综观安源大罢工的全过程，不能不对李立三在这次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

李立三接受任务

1921年12月11日，李立三被法国当局押解回国抵达上海，他与蔡和森一起找到担任中共中央书记的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陈独秀的派遣，李立三没有在上海等待从法国寄来的行李到达，就拿着中共中央的介绍信赶到湖南长沙，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找到中共湖南党的负责人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向李立三详细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还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情况，希望李立三能到安源去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当即指示，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面，介绍李立三到安源。

1921年12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着李立三和青年团员、湖南一师附小教员宋友生，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生陪同，从长沙乘火车到安源。

在安源，他们住在老后街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店——刘和盛饭店，白天四出访问工友，晚上约一些工友到客店来座谈。毛泽东离开安源时，决定由李立三常驻安源指导一切。

创办平民学校

李立三留在安源，他给萍乡县的知事范子宣用“四六体”写了一份备案的“禀帖”，中心意思是“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果然得到县知事的“青睐”。县知事又得知李立三是刚从法国留洋回来的，大为高兴，很快就找到李立三去谈话。李立三说：“我准备在安源办个平民学校，教工人读书识字，希望县大人早日批准。”“这个办法好，我很赞成！安源那个地方嫖赌逍遥的恶习必须纠正。”县知事满口答应，立即命令司书写了一张布告交给李立三。由此，李立三取得在安源办学的公开合法身份。

李立三在五福巷工人张紫民家的楼上办起了平民学校，动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拨给的经费，让最初入学的三、四十个工人子女免费入学，李立三直接任教。

李立三在办学过程中，以访问学生家长名义，广泛与工人群众接触。向他们宣传团结奋斗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现和训练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很快从中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由3名团员组成的“小团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路矿支部，由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

创办工人补习学校

其间，李立三到北京长辛店考察了工人运动。

从北京回安源以后，就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附设于平民小学内。李立三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桌椅都是由工人自己带来或借来的……黑板也是由工人自己动手做的。”开学时，学员只有一二十人。李立三穿件蓝布褂子，一家一户去串门，动员工人来读书，工人都叫他“游学先生”。后来逐渐增加到四五十人，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下，分为两个组。使用的课本有两种，公开使用的是平民教育的课本，实际是李立三自己编写的。

李立三给工人上课，把文化课和马列主义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如，他教“工人”二字，先教学员分别认识这两个字，再把工人二字一上一下写在黑板上，向工人说：“工”、“人”两个字上下连起来就是一个“天”字。说明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再比如，工人称呼他为“先生”，他就教学员先认识一个“牛”

字，然后在“牛”字下边划一横杠，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字。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先生”也不过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先生”并不高明。工人们听了哈哈大笑，点头称是。趁此，他对工友说：“以后你们不要叫我先生，就叫我老李或能至吧。”

补习学校的课本通俗地告诉工人：“现在我们中国人民，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打倒军阀，才能得到解放。”“工人阶级只有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实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李立三在课本中还利用文艺的形式，对工人进行阶级启蒙教育。

创建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

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由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湖南支部。

4月16日，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主任。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下召开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俱乐部人员三四百人到会。闭会即举行游行活动。时大雨如注，沿途，李立三带头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并散发传单千余份，游行队伍走遍了安源的街道。李立三又登台讲演，他说：“今天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现在宣布一件大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我



李立三 1922年在安源

们是泥巴饭碗。泥巴饭碗打烂了到处可以找。我们不怕丢掉这只饭碗！”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报刊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讲到：“长沙方面，已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由于李立三同时在安源和长沙领导工人运动，所以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时，他与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一同当选为委员，毛泽东担任书记。当时共有30多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指出：“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 and 劳动条件而努力。”李立三从长沙文化书社等处筹集资金百余元，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并任总经理。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



1922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委会委员合影，前中为李立三

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商店，对于减轻商人的中间剥削，训练工人管理经济的能力，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酝酿罢工

1922年7月，在汉阳铁工厂工人罢工胜利消息的鼓舞下，李立三组织党团员到各工作处日夜宣传鼓动，加入俱乐部者日以数十人计。

9月7日，毛泽东到达安源，召开了安源党支部会议，他告诉大家：从目前安源实际情况来看，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使资本家让步，非罢工不可。罢工中，要胆大心细，要有勇有谋。

9月10日，路矿当局请萍乡县公署正式发出布告，训令俱乐部自行关闭。李立三立即向工人明确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同安源工人一起战斗！”

此时，矿长一看形势不妙，一

再声称这是一场误会。他还发誓答应要对俱乐部加以保护。李立三趁此以俱乐部名义向路矿两局提出三条要求：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每月开支二百元；发清积欠工人存恤。

12日，李立三收到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要他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李立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这时，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刘少奇，于9月11日来到安源。

12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与刘少奇一起研究了罢工的具体计划。首先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全面指挥罢工斗争。为防止敌人对李立三进行谋害，会议决定罢工开始

后，李立三要隐避策应，由新到安源、很少有人认识的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同时，起草了《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等17项复工条件。

争取洪帮

当时安源最厉害的是帮会，洪帮势力最大，工人不加入洪帮就难以找到工作。洪帮的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要求得罢工的胜利，不争取洪帮就寸步难行。李立三最担心的是洪帮破坏罢工。为了争取洪帮，李立三积极做洪帮小头目的工作，并从中发展了两名党员。

9月13日，李立三找了两个小头目带着他去会见洪帮头子。李立三提着两瓶酒、一只大公鸡。帮主

章龙一见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亲自登门拜会，是看得起他，非常高兴，一口一声李主任。李立三爽快地向他一起共喝鸡血酒，喊了声“大哥”！然后说：“我们要罢工。”还告诉他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的利益，请你多多帮忙。帮主章龙拍着胸脯，连声说道：“一定帮忙！一定帮忙。”李立三接着向帮主提出了在举行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鸦片烟馆关门；街上的赌场收摊；不发生抢劫案。帮主又连拍三下胸脯说：“我包了。”

13日晨，矿长、路局局长派人把李立三请去，他们的答复是：一、两局已呈请县署批示保护贵部；二、津贴俱乐部常费，候报请总公司批准后实行；三、积欠的工人存饷，确因财政困难，难以在月内如数还清，先行发放上月饷银。请转告众工友，理解两局的一片诚意，劝大家安心上工，切莫闹事。

李立三听完答复，愤怒地站起身来，盯着路局局长李毅寰，逐条进行批驳，坚定地说：“你们别哄人了，你们视工人的正义要求为儿戏，企图蒙哄是办不到的。”

9月14日零时，汽笛怒吼，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有株（洲）萍（乡）铁路沿线工人和安源矿区、紫家冲分矿全体工人共13000多人。列车停开，车头及水柜各种主要机件完全卸下，工人们高举手镐，如潮水般涌出窿外，涌出工房……

大罢工开始，俱乐部把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秘密迁出，工人把总指挥李立三藏了起来。据李立三说：“罢工（开始）之后，我一天换三个地方，后来换在一个山后面的砖瓦窑里，两个工人陪

着我，在窑中住了两三天。”

俱乐部还把《罢工宣言》邮寄给全国各大报馆，吁请社会各界声援。长沙、上海、北京等地的报刊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安源大罢工的报道。一时，安源大罢工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面对工人的大罢工，路矿两局恐慌万状。一面派代表与俱乐部接洽，一面阴谋加以破坏。

总监工王鸿卿又密遣暗探去刺杀李立三。他对暗探许愿说：“事成之后，赏银洋600元。”王鸿卿又告知总公事房，要文书写悬赏令，捉拿李立三。湖南军阀赵恒惕也到处张贴“通缉令”，限期抓捕“匪首李能至”。工友闻此大怒，对李立三严加护卫，不让他外出。

罢工开始后，俱乐部监察队佩带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带着铁棒、岩尖等武器，组成若干小分队，雄赳赳的在各街市和厂区站岗、巡查，以维持秩序。墙壁贴满俱乐部的布告：“候俱乐部通知方可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联络。还派出侦察随处刺探消息，防止敌人破坏。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无不佩服。

16日午刻，路矿两局派人来俱乐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刘少奇前往矿局办公大楼与戒严司令见面，声言不从磋商条件人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多方恐吓，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临危不惧，严辞驳斥，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下午四时，路局代表李义藩（株萍路局机务处长）、矿局代表舒季俊（萍矿总局文牍科长），偕商绅四代表，假民房与俱乐部代表李能至（李立三）磋商条件。至第二天凌晨二时始定议，计十三条。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原文如此），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双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个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晌，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矿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 舒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 李义藩 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 李能至 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协定

庆祝胜利

18日上午，签定条约的消息一传出，万余工人欢呼胜利，汇集到大操场，俱乐部即决定召开庆祝大会，在操场中央临时搭起一个演讲台，挂上俱乐部的旗帜及国旗。

下午两点钟，“数百名工友手持小红旗，拥着李立三来了。李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

李立三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做了大量工作，参与筹建了湖南全国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和汉冶萍总工会。这些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的陆续成立，为全国工会总联合会的成立，进一步奠定了组织基础。

特别是在李立三的主持下，1922年12月10日在汉阳三码头‘老街召开了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联合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汉阳钢铁工会、大冶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大

冶钢铁厂工会等五个工会团体，代表工人总数达3万多人，可算是当时中国一个最大的工团了。

1923年4月，中共中央对李立三委以重任，调他去担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到那里去收拾残局，恢复在“二七”惨案中被摧垮了的地下党组织。他在安源所担任的党的书记一职由朱少连接替，所担任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一职由刘少奇代理（1923年8月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为总主任）。

与此同时，为了保存干部，中共中央把在武汉工作的陈潭秋、李求实以及贺昌、唐绍予、黄无一、黄静源、李树彝、龚逸情、任岳、肖劲光、陈清河、刘士奇、徐全直（女）、何葆珍（女）先后调到安源，分别在党团工会组织和工人学校工作。在中共安源地委领导下，一大批外来干部同安源工人中涌现出来的领袖周怀德、袁德生、刘昌炎等团结一致，创造了“特别出奇”的成就；在全国工运低潮期间，取得了新的胜利和发展——安源成为广东以外全国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李思慎：河北省政协常委、原李立三秘书）（责任编辑：刘文）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发行

《炎黄春秋》创刊七年来在国内读者中享有较高声誉，在海外也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很多新订户要求购买前几年的刊物，但1995年以前的存刊除少数几期外，已全部售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这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欲购此书的读者，可直接向我社发行部汇款邮购。各卷定价分别为：

《历史迷案揭秘》定价 22.00 元

《政坛高层动态》定价 23.00 元

《名流写真》定价 23.50 元

《血荐轩辕》定价 23.80 元

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 的挂号邮费。

本社地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辑：100007

电话：(101)64072452

联系人：谷世章

三次思想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 马立诚 凌志军

以 1978 年、1992 年和 1997 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今天我们回顾 2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思想解放的线索是一以贯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在心理上会将 1978 年、1992 年和 1997 年分开，看成是三次思想解放？照我们的观察，将 90 年代的思想解放同 70 年代末期以至 80 年代分开，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的两三年里，无论理论的还是实际的进程都呈现出另外一个方向，那时的舆论也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扭转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方有了思想解放新的高潮。

自此以后，思想解放的势头是始终不渝的。换句话说，1997 年的局面，乃是 1992 年的继续，因之也可以说，第三次思想解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继续：从冲破“姓社姓资”到冲破“姓公姓私”。将这个过程总括起来，叫做不再搞“所有制崇拜”。它包括两大思想成果：其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其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理论。

如若将 90 年代的思想解放同 70 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相对照，可以认为，那一次思想解放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源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那一次是打破“个人崇拜”，这一次是打破“所有制崇拜”。

较之打破“个人崇拜”，现在的打破“所有

制崇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加困难，耗时也 longer。前者经历大约一年的讨论和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大致完成；后者已经经历 5 年时间、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两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仍然不能说彻底地完成了。

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解决那些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防止“左”与反对“左”，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

第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摆脱枷锁般的解放感，给九州大地被压抑的生命带来跃动的复苏。

第三，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上台阶”，催动经济发展出现新高潮。

第四，思想解放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一个高潮过去了，还会出现新的高潮。

下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复”乃至“高潮”，将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没有预卜未来的智慧，只是猜测，可能出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在这样不断地前进、开拓、建设中赢得了成功的希望。

1997 年 8 月的第一周，断流 132 天的黄河下游河道恢复过流。大河东去，无论怎样的阻力，总还是要恢复它的常态。这情景有些像中国改革的历史。

（此文转载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结束语”，我们将原标题“三次解放”改为“三次思想解放”。）

费孝通

治学济世皓首不移

● 张彦 裴毓荪

“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

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费孝通先生主要是在云南大学任教，在联大只是兼课。他当时已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我们则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共同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却把我们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了。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学生带头在昆明发起了规模宏大的“反对内战”运动，一大批教授挺身而出表示声援和支持。蒋介石不惜以卑鄙手段来除掉这些教授中最敢讲话者。民主斗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就是在这样的枪声下倒在血泊中的。

1945年11月25日晚，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反对内战时事讲演会，与会者6000人，这一天的大会讲演者是四位著名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钱端升讲的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他指出：“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料，围墙外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队已经包围了学校。教授们依然神情自若，一个接着一个起身演讲。当轮到费孝通演讲的时候，枪声大作。他站在全场最高的地方慷慨陈词。他讲的题目是：《美国与中国内战的关系》。他呼吁：中美两国人民联合

起来，共同反对中国内战！他用比枪声更高的声音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

枪声激怒的岂仅是与会的师生，学生的罢课和发表的反内战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反响。12月1日，反动当局组织暴徒向爱国师生投掷手榴弹，四名师生壮烈牺牲，数十名学生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从此，一场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迟到的知识分子的春天

在建国初期的那几年，费孝通先是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从事民族研究；后来又从专家局副局长的角度，去关心知识分子问题。

1956年春，党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知识分子无不额手称庆。《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实事求是地说，虽已入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还是早春天气。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是最难将息的时节。这



作者张彦(左)裴毓荪(中)会见费孝通老师

篇文章，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共鸣，同时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是，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鸣放热浪。

谁知，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下子把毫无思想准备的费孝通卷进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一夜之间，他和另五位知名教授成了闻名全国的六个“大右派”，他还荣幸地受到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的接见，亲自为他解除“思想顾虑”。至于局势为什么这样突然急转直下，直到三十年后的1987



1956年毛泽东和董第周、胡愈之、华罗庚、费孝通(左1)在一起

年，费孝通在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曾经这样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这一突变，再加上随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写了费孝通的历史，使一个才华出众、年富力强、志在治学济世的优秀知识分子，从此“沉寂”了23年！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仅有过两次接触，但每次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里，费先生和费师母相依为命，在那一居室里过着最简朴的生活。费先生显然已经从茫茫然中解脱出来，谈起他在体力劳动上的意外收获，兴致勃勃，他认为，在旷野里劳动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体验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多地接触社会和人心。费孝通虽已年过花甲，身体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多年的哮喘病好了，能吃、能睡、能劳动。

我们第二次见面，已是1972年。费孝通已经回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和他的老师吴文藻、师母谢冰心等人组成了一个翻译组，正在将

两部著名的世界历史书翻译成中文。我们走进那间相当宽敞的办公室，看到几位老人都在安静地埋头工作。费孝通见我们来，惊喜万分，连忙把我们带到了会客室。他正在翻译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对于英国大史学家的这本世界名著的原著，费孝通从当学生起就不知读过多少遍了，现在，他要通过自己的笔把它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从中受益。他告诉我们，这一阵子，他有时突然被请去出席接待外宾的场合，使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自从他被“打入另册”以后，“洋人”已经成为他的“禁区”，为什么现在又主动让他去呢？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候。

当时曾经来华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为我们提供了“注释”。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费孝通的：“在那次宴会上，我们还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刚从干校（‘五七’干校）回来，他说他在那里学会了种棉花。他挽起衣袖，指着那结实的手臂说，这都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的时候锻炼出来

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据说有人通知过他不许用英语与我们交谈。后来，我们访问了他所在的民族学院，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这些教授朋友仍然未完全摆脱控制。”

事情又起变化了。1976年10月，一夜之间，“四人帮”戏剧性地垮台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终于宣告结束。费孝通迎来了否极泰来的这一天！1978年，费孝通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副所长，重新开始了他已经长期中断了的民族研究课题。11月，他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联合国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第一次出国。

瑶山林中寄深情

就在这同一年，张彦作为记者，有幸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与作为贵宾应邀出席的费孝通相遇。会后又一起驱车去重访少数民族瑶族聚居的大瑶山。一路上，费先生追述他43年

前和新婚夫人王同惠第一次来此作调查时所发生的那场悲剧。那是1935年12月16日，他们俩在这曲折险峻的山区里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天色渐暗，他们摸索着前行，看见一处似门的装置，以为到了房舍，其实那是山民设的虎阱。费孝通正趋前查看，一踏机关，便陷落下去，接着木石齐下，把他砸压在坑底。惊慌之中，王同惠奋不顾身，将木头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的腿脚已受重伤，起不来了。王同惠安慰丈夫之后，赶紧出林求援。谁知，她从此一去不返。费孝通在这荒山野林里心急如焚地熬过一个寒夜，第二天刚破晓，便忍痛向外爬行，直到傍晚才遇到一个瑶人将他背回村子。费孝通一面住下养伤，一面恳请瑶人四出搜寻。到第七天才在一条急流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这个年方24岁的人类学学者，不幸牺牲了，她与费孝通结婚才一百零八天！

费孝通悲痛中，一边在医院里养伤，一边请人精心设计爱妻的墓地。下葬时，他要求棺木用两条粗铁链悬空吊在墓穴当中，使之不沾泥

土，保持其圣洁。费先生说，在他的感觉中，她并没有死，不过睡着罢了，我是要让她睡得更好一些。在养伤期间，他开始整理他和同惠一起在瑶山调查时搜集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作为他与志同道合的爱妻共同对中国人类学研究所作的一点贡献。半年以后才告完成，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到了大瑶山的金秀瑶族自治县以后，张彦惊异地发现，这里的人不是把他作为“首长”来接待，而是异常热情地在欢迎一个多年外出的游子的归来。县长、书记并没有一本正经地向他“汇报工作”，而是一个劲地跟他唠家常。他也像亲人回老家一样，东家串串，西家坐坐，看看大家究竟日子过得怎么样。按照瑶族的习俗，迎接亲人最隆重的就是吃“大团圆饭”，几十个人围着一大圈的小条桌坐着，桌上摆满了具有瑶家特殊风味的家肴，边吃、边喝、边唱。

回来以后，费孝通应张彦之约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热烈反响。没想

到，这篇文章却引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费孝通在梧州安葬爱妻王同惠时，立有一个石碑，上面他亲笔书写了长篇碑文。自从费孝通成了“右派”和“牛鬼蛇神”以后，这块石碑就消失了。1970年，也成了小“牛鬼蛇神”的梧州中学教师邱艾军，在挖土时无意中挖出了这块石碑，被碑文中流露的深情所打动，便悄悄搬回家保存起来。为了避免招来横祸，他把石碑放在门前当石台子用。这石碑一躺就是八九年。读到费孝通的文章后，邱艾军立即与费先生取得联系，1988年12月16日，费孝通终于回来重修了王同惠的墓地，带着他的外孙女在墓碑前献上了花篮。百感交集的费孝通，用五言诗的形式，记录了他在墓碑前与同惠的又一次的灵魂对话。其中，有这么几句：“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墟”。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第二次学术生命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为费孝通的“错划右派”正式宣布“改正”。“改正”二字多少辛酸！一生中最宝贵的23年再也不会回来了。费孝通没有为此空悲切，而是把眼光投向未来。他当场就向在座的人表示：“我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了，不该随意零星地买些花生米吃，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幽默与诙谐之中，蕴藏着他未了的雄心壮志。当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他估计还会有十年的生命用来做他迫切想做的事情。他当众宣布：“要用这十年去夺回那失去的二十多年！”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自此时起，费孝通大部分时间



194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一起，前排左3为费孝通，左6为裴毓荪

都穿梭于广大的农村和城镇，紧紧追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的发展和变化，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冷静地作出分析。每到一处，他必写一篇文章，有时是一篇很大的文章。这种文章既不同于记者的报道，也有别于学者的论述。这是费孝通式的行程报告，在带有泥土气息的生动描写中，人们不仅爱看，而且读了能用。如《故里行》、《温州行》、《重访云南三村》、《海南行》、《侨乡行》、《凉山行》、《珠江模式的再认识》……



1982年，费孝通又一次来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各族姐妹见到老朋友，喜不自禁。

中国农业生产发展以后，成亿的剩余劳动力往哪儿去？这是个大问题。费孝通认为，发展工农结合的小城镇可以成为这些劳动力的蓄水池，是解决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出路。于是，他所写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影响深远，以至受到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亲笔批示，希望大家好好读读。

这些年来，费孝通一直坚持他作社会调查必须追踪研究的传统。对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方，抓住就不放，再三地去看它的发展，分析它的变化，求证于它的成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因此，就有了他的初访小岗、重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二十八次访问家乡江苏……实地调查之频繁，工作效率之高，实在是令人吃惊。几乎是行万里路，写十万字。十年下来，单是这种一篇篇的行程报告，积成50万字的著作《行行重行行》已一版、再版，汇成了一部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发生历史变革的全景画卷。与此同时，他的新著和再版书还一本接着一本问世：《访美掠影》、《民族与社会》、《非洲的种族》、《重访英伦》、《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社会学的探索》、《社会调查自白》、《逝者如斯》、《芳

草天涯》、《爱我家乡》、《学术自述与反思》；……我们每每从费先生那里得到一本书，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读完，新的一本又来到了手上。这些年来，每次拜访费先生回来，我们总是深深地为他这种为治学济世而争分夺秒的精神所激励。

这些年里，费师母孟吟女士长期患病，最后几年成为植物人。他们夫妻甘苦与共，相濡以沫，达半个世纪。十分重感情的费先生，为了不让爱妻孤身住院情感上受到刺激，他决定始终留在家里疗养，请医生来治疗，由家人照料，请专职保姆护理。他自己再忙，也要抽时间陪伴她，直到她1994年底离开人世。

1998年3月，九届人大闭幕，费孝通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去看他，他正伏案读书，一见面就告诉我们：“我现在开始重新上大学了。”他见我们没有听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连忙指着桌上的几本大学教科书说：“我正在重读大学一年级课程。这是60年前从美国引进的社会学、人类学教材，我今天重新读它是为了批判地分析它，根据我们的国情和经验来写我们自己的课本。”

说这些话时，已近九十岁的费

先生，简直像个刚跨进大学之门的一年级新生。早在1939年，他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首先在英国出版，后来竟成为国外许多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教材。为此，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特别授予他这门学科中的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尽管一场政治灾难剥夺了他的学术生命达23年之久，一旦复苏，他就立刻快马加鞭地去做他朝思暮想的事情：让中国农民能富起来。

1990年，费先生80大寿时，他自己题写了一个16字诀：“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既是他的立志，也是他的一生写照。那时，他刚用完他口袋里的那“十块钱”。现在，他行行复行行，已经又是硕果累累了。他告诉我们：“明天，我又要出发了。”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尽管他已是白发苍苍，却依然红光满面，壮心不已。他又饶有风趣地对我们说：“五年以后，如果上帝开恩给个‘红包’，让我多活两年，那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现在，时间实在太少了！”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他又重复地以一句惯用的英语来表达他此时此刻的心情：“SO LITTLE TIME!”

(责任编辑：仲文)

毛泽东

要“旱鸭子”当海军司令

● 吴殿卿

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刚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兼职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正沉浸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后的胜利喜悦中，就接到了中央军委“主席召见”的电报。时隔一天，他就出现在中南海“含和堂”毛泽东的会客室里。

毛泽东见到肖劲光非常高兴，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来得好快呀！你们教训了‘小诸葛’，仗打得不错。”接着询问了衡宝战役后的情况，然后说：“解放全国的任务还相当繁重……空军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

肖劲光这时脑子里装的仍然是衡宝战役、湖南军区的工作，毫无思想准备，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哪能当海军司令？这么多年，我就坐

过五六次海船，还晕的不行。海军司令还是让别人干吧！”毛泽东摇了摇头：“要你当海军司令，军委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我们搞海军基础很差，现在除了起义人员带来的舰船、装备，一无所有。你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有经验。还有，我们搞海军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你留过苏，懂俄语，了解苏军情况，这些都是很有利的条件。”最后，毛泽东嘱咐肖劲光回长沙后，继续抓好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调海军工作的事，等军委的正式命令。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团赴苏访问。临行前，又找来肖劲光，向他了解苏联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他对海军建设的意见。肖劲光这次有了准备，系统地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连连说：“好，好，要考虑得更细一些，一步步落实。”1950年1

月，还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仍然惦记着海军的筹建工作。13日他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副主席发来电报：“可即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1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命令。

海军成立之初，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首先要解决的是房子。肖劲光带领一帮人员从湖南来到北京后，在前门外租赁了几家便宜的客栈和民房。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是借用协和医院的礼堂召开的。机关的办公地点，更是分散：司令部驻在东麻线胡同，政治部驻在西观音寺，后勤部驻在西四，工作十分不便。当时中央有的领导主张海军机关应设在沿海城市。肖劲光便带着这些问题去找毛泽东：“主席，我现在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哇。怎么办才好？”毛泽东问道，你们机关多少人？肖劲光

回答：“司、政、后，几个大部加在一起，900人。”毛泽东说，人不多嘛。海军机关是个战略决策机构，应该设在北京。没有房子，可以自己盖。这样吧，你们写个报告，我来批钱。此后，先是在贡院东街一块不大的空场上建了几栋三层楼作为办公地点，1953年以后，才在公主坟西南侧逐步建设了现在的海军大院。

1950年10月26日和1952年7月30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以个人的名义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对我海军建设给予装备援助和技术支持。在这期间，他还亲自给斯大林打电话，督促两国之间关于海军装备购置协议、合同的落实。

1952年12月12日，毛泽东冒着大雪视察了海军机关。毛泽东是视察了空军机关后到海军大院来的。一见肖劲光就说：“海军成立两年多了，我还没来过。今天一是看看大家，二是有件要紧的事要和你们商量。”接着，毛泽东郑重而又亲切的说：“要和你商量的是原先计划花几亿卢布给你们买几艘驱逐舰，买几十艘鱼雷快艇。现在抗美援朝急需飞机，中央打算集中财力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这样一来，外汇不够用了。是不是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事关抗美援朝大局，毛主席亲自来做工作，肖劲光还能说

什么？他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在场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等其他领导也都一致表示赞成。听了大家的表态，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就这样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可以买些材料自己造一点，上海的厂不是可以造快艇吗？”毛泽东走后，肖劲光立即召开会议，对装备计划作了调整。

1957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同时，中国还派出了有肖劲光参加的军事友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肖劲光同刘亚楼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本正经地问，肖劲光还晕船吗？刘亚楼还晕飞机吗？

肖劲光说：“现在好多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飞机，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历史已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政策”是正确的。空军在刘亚楼的领导下，边组建边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部队在横空出世的中国空军的有力配合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赢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海军在肖劲光领导下，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反击外来侵略、保卫海洋合法权益的斗争中，屡建功勋。肖劲光在海军司令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30年，这在世界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责任编辑：刘文）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肖劲光（左）与起义将领陈明仁在一起

君子章乃器

● 董秉弟

1977年5月14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则极不引人注目的消息:

章乃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章乃器先生在1957年以前为人民做过好事。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右派分子。1975年4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章乃器先生表示承认错误,愿意检查错误,吸取教训。

章乃器先生的追悼会于1977年5月3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由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当张劲夫、史良、沙千里、李金德等向章乃器遗体作最后告别的时候,那张端正的方脸上,仍然是像他生前一样,流露着刚强、孤傲而又坦然自若的表情。让送行的人更为感慨的是他居室前留下的那幅楹联:

实践检查真理 时间解决问题

……

那是红色风暴席卷北京的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城区灯草胡同一家四合院。他们翻箱倒柜,把书画、文稿、古董、抄走的抄走,烧毁的烧毁……

“老右派,你的民愤极大,要老老实实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才是你的唯一出路。”

红卫兵们教训一通之后才扬长而去。受训斥的老者茫然站立在院中,喃喃自语:“我章乃器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全没有我的份,可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役不与,这‘民愤’二字从哪里说起!……”

章乃器原名章埏,因《老子》的“埏埴以为器”一语而改名。他于1897年3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一个破落的乡绅人家。

章乃器15岁时,正值辛亥革命,他心怀救国之志,去南京参加革命政府创办的飞行营学习飞行。一年后因身体不支,退伍回乡养病。

1919年他到北京入通州京兆农工银行任职襄理,1920年转入中美实业公司任会计主任。

1927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尔后又主持创立国内首家中国征信所,任董事长,还被上海光华大学,汗江大学聘为教授,出版了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1936年11月22日,因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六位民主斗士一起被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中外

的“七君子事件”……

一部昔日可歌可泣的历史今朝却成了反动。没过几天,几个红卫兵又闯了进来,将章乃器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在举行别出心裁的“打人集会”,凡是经过“集会”的“黑七类”分子,大多是血淋淋的横着抬了出去……

这时,一个造反派一拳打在章乃器的右眼脸上,“老顽固,你交待不交待?”

章乃器没吱声,接着一顿皮鞭,白衬衫上顿时出现一道道红迹,章乃器终于倒下了。民警救走了他,送往医院,医院不敢为这位“中国头号右派”治疗。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门诊部的长椅上给周恩来写了封便信:“总理,我被打成重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周总理当即打电话给医院说:“无论任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等待他的却是更残酷的迫害。他在“七十自述”中写道:“8月25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用油漆涂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章乃器绝食了,一人孤单单地在床上躺了八天。他遍体鳞伤,胸、背、股、膝处处疼痛难忍。他睁大眼睛盯着黑沉沉的夜,等待着明天的恶运降临。

红卫兵们对他这种文明的“绝食”抗议是不屑一顾的。决定把他扫地出门,于是七手八脚地乱搬东西,把床上的被褥也拖出门外。就这样章乃器被赶到了北京东郊呼家楼19楼三单元404室——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房间,厕所占去了3平方米,除了一张旧双人床

外，一个堆满书的小柜子，还有一张退了色的旧三层桌，就再也没有别的大件东西了。邻居是一位耳聋的老太太，她已占用厨房，章乃器只好把厨房搭在小过道里，约二、三平方米，只够这位高大、秃顶、白了发的老人挤着身子做饭。

他蓄起胡须，安静地坐在小窗前的桌旁，吸着老烟斗深思……提笔作笔记：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主席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党整风，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而他作为党外的首任粮食部长，又是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常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当然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帮助党整风。他参加了三次由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第一次发言就上了《人民日报》，他感到意外，曾向一位领导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这位领导同志回答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运动有好处。”既然如此，5月13日，章乃器给座谈会又送一篇书面发言，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并说明自己的发言是“信口直书的，是草率的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次日他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座谈会上讲话》等等，都分别在《人民日报》、《工商界》月刊、《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了。把他对政治、经济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统统地讲了出来。尤其是那个关于“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的话，他曾两次致函毛泽东主席，反映某些党员干部搞宗派主义，工作片面性，往往是“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而不是大公无私……”

反右斗争开始了。这位著名的

爱国民主斗士被戴上了全国“大右派头子”的帽子，作为“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日子是难熬的，他几乎天天受到批判，他的发言本意被歪曲了，尽管章乃器写出了3万余言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他“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然而极左的人们仍然将他一言一论作为“大毒草”来批判。

章乃器被撤销了粮食部长的职务，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召见他。他表示：“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谎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章乃器丢掉了“官”，接踵而来的是他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职务被撤销了；人大代表资格和全国政协委员也被撤销了。彻底削官为民，一切工资待遇降了下来，但是他仍然不能安生……

章乃器的生命最后10年是在日坛公园附近民宅里度过的。他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组织照顾，连昔日的亲朋也离他远远的。

每日清早起来他去公园散步，锻炼身体，为自己疗伤。用完简单的早餐，便提着篮子上市场，购买些便宜的猪下水、土豆、萝卜拿回家来，自己动手做饭……

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亲自批准给章乃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接着，安排他到财政部当顾问。

这时的章乃器，身体已每况愈下，到了4月初，被送进了北京医院抢救。到了5月初，医生给他服药、打针都不见好转。就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儿子章翼军从包头市赶来了，女儿章晓华从合肥市赶来了，还有他的其他儿女、



章乃器

女婿和孙辈们都来医院陪伴着他。5月12日，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他见翼军、晓华、刘卫星都在身旁，向他们点点头，不断地落泪，痛苦地咬住嘴唇，血淌了出来。此时此刻，他该有多少心里话向儿女们倾诉，又有多少心里话要向他的朋友们倾诉，还有多少话要向中国共产党倾诉啊！

经过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他顽强地活到了80岁，然而一直没有实现再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的夙愿。

他留下一首自勉诗是这样写的：

能求祖国富强，
个人生死无足伤。
坏事终当变好事，
千锤百炼铁成钢。

真是一副铁骨忠肠！

1977年5月13日，他溘然长逝。

（责任编辑：仲文）

乡村建设实验家

瞿菊农

● 谭重威

瞿菊农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国内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助手，晏因公出国期间，瞿代理他的“平教会”干事长职务和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院长职务。晏早已享誉世界，但他没有忘记老朋友，

1985年，他应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之邀，回到大陆参观考察，当时瞿菊农已去世，他缅怀故友，专门宴请瞿菊农的子女（他们现在都是专家学者），在宴会上晏阳初深情地说：“我之所以在事业上有所成功，主要依靠两位助手，一位是陈筑山，一位是你们的父亲瞿菊农博士，他同我合作得很好，而且时间最长。”

瞿菊农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他放弃了著名大学的教授职务和舒适的城市生活，谢绝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薪聘请，在艰苦的农村从事农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亦即乡村现代化的研究实验，苦心孤诣，忍屈负重，二十年如一日，献出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瞿家的才子

瞿菊农（1900—1976）原名世英，江苏常州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叔，但比秋白小一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童年在常州

读私塾，后随父瞿寿申到北京就读于教会学校汇文学堂，故中英文基础均较好。1918年，他在燕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反帝反封建的思潮正在国内兴起，他很快接受了先进思想，与瞿秋白、郑振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探索开创新社会的途径。1919年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力的“五四”爱国运动，他积极投入运动，是燕京大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被选为北京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瞿秋白当时也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他们在上海积极从事组织、宣传、演讲活动，每天还要在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他和秋白写文章极快，被人誉为“瞿家的两位才子”。

“五四”运动之后，瞿菊农继续参加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1920年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茅盾）等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新文学，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同年他在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作研究生，1922年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任教。1922—1923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学者杜里舒和印度爱国诗人泰戈尔先后到中国讲学，瞿菊农担任他们的翻



1970年瞿菊农在北京师范大学宿舍。

译和助教，并由他译编出版了《杜里舒演讲录》10卷，又译了泰戈尔名著《春之循环》一书。此后，陆续翻译了顾西曼的《西洋哲学史》、康德的《康德教育学》等书，他自己也撰写了《西洋教育思想史》、《现代哲学》等著作，成为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者之一。如此丰硕的研究著译成果，对于一位青年来说，真不愧为风华正茂的才子。

采花酿蜜和博士下乡

1920年10月，瞿菊农提供路费送瞿秋白赴苏联，考察采访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在《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诗中鼓励秋白及其同行者俞颂华、李宗武：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你们回来的时候，希望你们改变、创造……

瞿秋白从天津寄了回信及诗，回信写道：

“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号里。”

字里行间表达了他们为国为民而“采花酿蜜”的心愿。

四年后，瞿菊农自己也得到出国“采花酿蜜”的机会。

1924年，他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获教育哲学博士学位。这时他才26岁，回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哲学与教育学，同时与金岳霖等人编《哲学评论》杂志，研究和介绍中外哲学发展动态。他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和写作，写了《教育哲学》、《进化教育》等学术著作。由于他的勤奋和善于科学

利用时间，工作效率很高，他走的治学，教授之路是顺畅而令人仰慕的。但他并不满足，正如瞿秋白所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他的努力，究竟能使中国大多数人得到多少好处呢？他在研究中国教育史时与外国教育史相比较，深感中国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中国教育是抄袭外国的，脱离了本国生产生活实际。中国社会的基础在农村，要使国家富强，众多农民必须受基本教育，教育必须下乡，研究教育改革的人也必须下乡；“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也必须下乡。这时，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爱国知识份子，兴起了下乡从事实际工作的趋向和潮流，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也把扫盲工作的重点从城市平民转为农民，并发展为将文字教育与科技、卫生教育及县制改革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瞿菊农与晏阳初的想法相同，可谓志同道合。1927年经“平教会”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介绍，瞿菊农参加了“平教会”的工作，任平民文学部干事，抽大学教学的业余时间，帮助“平教会”研究和编写扫盲教材《农民千字课》及研究民间文艺。因为农民文盲人数占全国人口80%以上，扫盲教材的质量如何关系重大，要编好教材，需做大量艰苦工作，仅用大学教学的业余时间是不够的。1930年他毅然辞去了教授职务，搁下了学术著作，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把家搬到“平教会”定县实验区，以全部精力投入农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从此成为晏阳初最得力的并且坚持最久的主要助手。当时先后参加定县实验的归国博士、专家、教授有数十人，大学毕业生有500多

人，深受舆论界和社会上的重视和好评，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

在定县实验区

瞿菊农博士到定县后，他以主要精力研究农民教育，为了使农民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掌握基本的文字工具，他和他的同事们工作非常认真，搜集了一百多种平民书报和应用文件，从50多万个单字中，以常用次数选字法统计其常用次数，选用其常用次数最多的3420字编为通用字表，再与搜集到的全国10多种成人用字表综合比较，结合农民习惯用语、用字精选出1320字编成基本常用字表，在此基础上，深入农村，了解农民，一面编辑，一面教学，一面修正，经过六次修订，编出以词语为本位的《农民千字课》，力求教材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并具有科学化、现代化、大众化的特点。《农民千字课》发行一千万册，行销全国，对中国农村的扫盲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还做了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教学辅助材料的研究，词语的研究整理，社会上习用的简化字的研究整理，拼音注音的研究实验等，为中国的文字改革进行了较早的探索。定县实验为了实施导生传习制，由专家编著的一系列教学辅导书籍，如《怎样做导生》等都是经过实验并由瞿菊农校阅出版的，质量很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他还与曹日昌（他的学生）等合作，进行教学效果的测验研究，从对三万多人的测验中发现16岁到31岁为学习效率最高时期，从而确信对农村失学青年和成人进行教育的必要和可能。

这些工作，既繁琐又细致，需



1924年印度名诗人泰戈尔访华，瞿菊农担任翻译。

要有文化科学水平较高的人去参与设计指导，而且还需要有服务热忱和无私奉献精神才能长期坚持，因为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远不如高等学府的教授，正如晏阳初所说：“我们这个由穷书生的结合靠募化来维持工作的私人学术团体，完全是在困窘的生活中努力支撑。”

定县实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一个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被发动起来了。盛誉之下，谤亦随之，瞿菊农不畏人言，在报刊上发表了《“人”的基础》、《以工作答复批评》、《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等

文章，简要地阐明了乡建工作的意义、目标和态度。他在工作中与实验区各部门紧密配合并与一些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合作，他在“平教会”内外起着重要的协调和联系作用，他的才干和为农民服务的真诚，受到晏阳初的特别倚重和信赖。除了主持研究工作之外，他还先后担任了“平教会”的总务主任、秘书主任等职。

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省推广，但因抗战爆发，实验和推广工作都不得不停顿下来。对定县实验的评价，《晏阳初传》的作者吴相湘写道：“定

县实验的进行，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的第一等计划、做出来的第一等工作。”这几个第一中，当然包含着瞿菊农的一份功劳。

华西实验与乡村教育

日军逼近定县后，“平教会”向后方转移，经湖南、贵州辗转到达四川重庆。因为抗战期间已不能开展乡村建设，晏阳初决定为战后乡村建设培养人才。在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帮助下，1940年在北碚大磨滩创办了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扩建为乡村建设学院。1943年晏阳初因公出国，由瞿菊农代理院长职务。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平教会”继“定县实验”停顿十年之后，又在重庆附近的璧山县成立了华西实验区（初名巴璧实验区），先在璧山四个乡试点，逐步扩大到北碚、巴县等十个县一个局（北碚当时为相当于县的管理局）。作为“平教会”研究部主任的瞿菊农，要研究和编辑切合华西实验区实际的新教材。1947年，他将乡村建设学院的院务交给梁仲华教授代理，自己去南京主持“平教会”南京办事处的工作，指导农民教材及各种读物的研究编辑，安排南京和璧山两处的编研人员分工合作。

晏阳初在美国朝野知名人士中，进行了大量活动之后，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援华法案的晏阳初条款，决定将援华款项的10%用于中国农村改造，不久成立了中国农村复兴中美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晏阳初是委员之一。华西实验区因此可以得到充足的经费援助，可以扩大实验区域和增加建设项目。也为瞿菊农实践他的教育改革和乡村建设理想提供了新的机会。

瞿菊农参加了华西实验区的设计指导工作，他在自己起草的《中国乡村建设初步计划纲领草案》的前言中写道：“乡村建设即从基层出发之社会建设工作……以科学技术改进农民生活，以组织发挥农民力量。而科学之接受与组织之形成，必以教育引发而培育之。自力之革命为真革命，他力之革命为伪进步。”

华西实验区的农村建设计划比定县实验的方案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以教育为推动建设的中心力量的指导思想。教育与建设的关系是，教育是建设的手段，建设是教育的内容。

因为晏阳初忙于“农复会”和其他工作，在家的时间较少，瞿菊农受命参与华西实验的研究设计和重大决策。但他始终把农民教材的编研放在重要地位。在他的

指导下，先后完成教材 10 余种及国民通用词表的编研工作；华西实验开始后，他组织专家分别在南京、璧山编研新的教材，在他的参与和指导下，1947 年编制成新的国民通用词表，翌年，新编了以失学农民为对象的《农民读本》，还编了《应用文》，这是基本教材，同年，为了实施导生传习制，还编了农民读本的《传习指引》、《辅导参考书》，并再版了《怎样做导生》等书，这些书都是在南京经过瞿菊农参与研究或经他认真校验后出版的，质量很高。另有补充教材，是为建设活动所需的，每一项具体建设活动，编一套教材，如防治螟虫等编印了传习画片，请种中农 34 号稻等编印了传习连环画，这类教材是在璧山编的。这些教材在华西实验区的传习教育网即时传习，即时建设，做到了“教、学、做合一”。因为教育与农民的

经济生活发生了密切关系，只要教学有方，就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改造生活的积极性，所以推行的时候助力多而阻力少，效果显著。同时，实验区还重视了农村小学的改进，派大学毕业生去乡村办示范小学，防止出现新文盲。

华西实验原计划 15 年完成，但时代机遇不好，璧山、北碚、巴县共 50 个乡开展了两三年、其余各县只几个月就结束了。尽管如此，乡村教育和经济建设仍取得一些成绩，50 个乡的失学农民 60% 以上扫除了文盲，科学技术得到推广，农民增加了收入，乡村卫生也有所改善。

华西实验最大的优点是做到了教育与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为晏阳初、瞿菊农的教育理想作出了典范。

(责任编辑:致中)

脑中风与生命源 DHA 降脂胶丸

祁所长：

我母亲 73 岁，去年患脑中风。请问“生命源 DHA 降脂胶丸”能不能治疗脑中风？

苏文祥 98. 7. 18

苏文祥先生：

你母亲患脑中风，不知道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脑中风的死亡率很高。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因脑中风死亡的比例高达 21. 7%。你的母亲算幸运的。

脑中风俗称脑血管意外，为突发性，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当血管腔里因血液中的脂肪过高，胆固醇或甘油三脂沉积在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和不平滑，因而阻断或减少血液的供应。管壁的不平滑会使血液在此凝固，形成血栓。血栓长期累积逐渐扩大，阻塞原本狭窄的管腔，血流因此供应中断，即形成中风，这一类型称内脑血

栓。此外血流冲击血栓，造成管壁血栓脱落卡在更小的血管中，形成另一类型的脑中风，称为脑栓塞。如果有高血压，一旦血管破裂后，其破裂处会被大量的血液压迫，也是属于脑中风的类型，称为“脑出血”。

由于高血脂是导致脑中风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因此有效地降低血脂，可预防脑中风的发生。生命源 DHA 降脂胶丸其有效成份 DHA (22 碳烯酸)、EPA (20 碳 5 烯酸) 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高效降血脂物质，并且无任何毒副作用。你母亲可以服用，1—2 疗程 (1 个月至 2 个月) 可见明显的变化。

祁所长 98. 8. 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48 号

邮编：100083

电话：010—62351917、62044313、62342031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

● 曾彦修

这多年来，我们经常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往往是讲给外国人听的。可是，我以为这两句话对我们自己却是更加十百倍地重要。对党国大事中的前车之鉴，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在中国大约有两种：一种是重视，不回避。为了避免历史性错误的重复出现或扩大出现，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公开研究，普及教训，用以提高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识别能力，不要再盲目地、奋不顾身地去响应种种政治上纯破坏性的号召了；另一种则是压制研究，即三个不准，不准写、不准读、不准发表以至不准研究。他们要党员和人民都永远处于阿斗即永远盲目服从的状态。这后一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若要坚持下去，就难免会有疯狂性的政治运动重新产生。

后面这种态度，在今天更是特别错误。今天我们国家当然不是一切都大吉大利了，但

这二十年的胜利之伟大，三千年的历史哪里有过。这二十年是鸦片战争以来（快160年了）中国最安定、最太平、一心搞建设、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发展最迅速的二十年。上面这段卓见是今年我去看望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友人王以铸兄（也划了右派的）时他脱口而出的，其天真喜悦之状，不可言喻。可见，把知识分子看成异类或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点，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包括解放以前在内）很多难于收拾的特大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另一基本原因就是必须内部“天天斗”）。

韦君宜同志的这本《思痛录》，我看主要目的就是要用一些亲身亲历的事实来说明这个主题：希望过去专门以整人、尤其是整知识分子作为为政第一妙道的各种政治运动，万万不要再搞了。这二十年来是基本上没有大搞政治运动，

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一次又一次地反这样反那样的大小运动，其实是没有断过。这二十年为什么在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成绩远不如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呢？很简单，一切都要定于一人，“双百”方针似乎已不必要再谈了。文化思想的成绩是要靠下苦功，十年八年才会看出一点真成绩的，靠年年批、月月批只能毁灭一切文化生机。忙于打倒一切的人，首先损害的必然是自己。

韦君宜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无限忠诚，从对党无限热爱的立场出发，以瘫痪病人之躯写出这本《思痛录》，顾名思义，即痛定思痛之意。她所说的一切运动我都经历过，而且什么帽子都戴过（韦好像只是几乎被戴上“右派”帽子）。不管韦君宜对过去的各种错误的、无中生有的、以打击人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运动，有多么不满以至于否定的意见，但她对党、对争取全民族、全人类

最高幸福的共产主义信念仍然没有丝毫动摇。在中国选择加入共产党来救国救民的人，我们都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如果还有下一生的话，我们的回答还是这一句：我们仍然要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这些从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亲眼看见确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先烈们把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挽救过来的！

韦君宜的父亲是抗日战争前的一个铁路局长，她如果不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全中国与全人类的解放与真正的幸福而奋斗，她为什么要抛弃她的优裕生活而投身共产党呢？入党后又受到了这么多的教育，怎么会因为受到一点不公正待遇就会动摇自己绝对忠实于为人民求幸福的共产党的信念呢？

韦君宜的这本书，把她从抗战初期起经过的种种重大政治运动都写上了，由于篇幅不大，本人健康更差，自然不可能写得详细。但是以一个亲历过这些运动的人去写这本书就是非常真实可贵的。看了此书，就可以看出很多政治运动的真实情况。本书中指陈的现象，较之实际，当然只能是九牛之一毛。但就是这一点点材料，也可多少看出过去有些政治运动是何等的荒谬与何等严重的自我摧残了。

作者告诉我们，“大跃进”的第二年，即1959年，“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82页）。作者很清楚，有些地方，全家都饿死了（实例是安徽合肥的，见83页）。这

里反映的当然只是一星半点，实际情况往往比这更惨痛得多。韦在乡下亲眼看见，庄稼熟了却不准老百姓去收，只准在既无燃料、又无原料的条件下驱赶老百姓去“大炼钢铁”，连县委书记也抗不过这种荒唐事情，只

能跟着老百姓说说俏皮话：“过了秋收吃钢铁吧，有个咬嚼劲儿！”这种历史上的空前怪事，再过几千年也无人能够猜透：为什么命令农民把成熟了的庄稼烂在地里，饿死人，拆了房子当柴烧，拿去“大炼钢铁”呢？而且这又是全国性的“运动”，并不是哪个村干部在胡搞。如此等等是怎么回事呢？作者告诉我们：“七千人大会”（指1962年初在北京开的从中央到县的干部大会）名为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教训，但是最后总结的却只是“别人蠢，自己没经历还不知道，一定要自己蠢了，方知道”。谁蠢呢？没有指名。那就是大家都



在清华上学时的韦君宜，时年20岁

蠢了。实际上到底是谁蠢呢？全国会种地的老百姓无有不知一亩地不能下二百斤种，不能收十万八万斤粮的。他们何尝蠢来？”（85页）

对于永远叫人不能理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作者很概括的指出：“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全世界还不曾有一个国家（哪怕是嗜杀成性的暴君统治的），会如此大规模地自己动手毁坏国家，杀害大臣，关闭政府如同儿戏。但是，这不是梦。”（101页）话似乎有些尖锐，但总没有事实那么可怕。那时候，全国都像个大监所，大刑房，又像个万兽角斗场。我那



韦君宜(右1)及其弟妹

时在上海,以文化人为主组成的“牛鬼蛇神”队伍经常要到一郊区水泥制品厂去劳改。当时傅东华先生年已七十余,我国有名的文化人,也要去参加。晚上回来“勒令”“牛鬼蛇神”电车不准坐乘,只能一站到底,我们动身回城时已七点多钟,车上人少,空下很多座位,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坐,地狱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规定?话说回来,我以为韦君宜说得是对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找不到类似的怪事。

韦君宜有一次下乡去“视察”“右派”的改造情况,在她同一个“右派”谈话后,“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玻璃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90页)因为这个“右派”确实是个左派,什么罪也没有,他是在外单位“平衡”比较之后由人家要求增补为

“右派”的。这就是说,要求“向右看齐”,也就看齐了。

我以为全书写得最好的是《记周扬》这最后一节。首先,作者对周扬在历史新时期的痛心忏悔的提法,就比别人高明。她说:“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的人物,作过无数次报告。那时真的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文艺界讲开放,讲重写文学史的最值得研究、最有价值的。”(190页)这里,韦君宜看得很高很远的,就是最后这几句话。她没有把这仅仅看成是周扬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极左文化政策、整人政策的最终破产。

但是周扬1983年却在—

个借口下遭到严厉的批判。周扬1983年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中因提出应当适当肯定人道主义和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异化”问题,而遭到了迎头痛击,罪名极大。一次,周扬曾问韦君宜对这个批判有什么看法,韦以不懂“哲学问题”为由,违心地把问题推开了,但心里却一直十分不安。作者说:“我还是那个不

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的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199页)

不,承认自己有过虚伪的人,也是天真的!人们会理解你的,韦君宜大姐!

韦君宜的这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它文笔简洁流畅,无废词废句,通俗易懂。它很好的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亲切、朴素而深刻。

我以为上上下下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估计没有人会逆着民心出面来禁止这本书的吧?

(责任编辑:思云)

毛泽东 批阅 《红楼梦》

● 申 春



原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路工先生因病于1996年10月25日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我和他交谊甚笃,他一生勤奋笔耕,著述颇多,出版过5本诗集,编著出版过10余本民间文学专著,他还喜好古典文学研究、摄影、文物收藏。

几年前的一天,我去看望他,他拿出深藏三十多年的毛泽东批阅过的《红楼梦》抄录本给我翻读,我一页页仔细阅读,字里行间注入了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思想精华。我曾关切地询问这手抄本从何处抄来?毛泽东亲笔批阅那本《红楼梦》现在何处?路工对我说,他是1957年在康生家中偶尔翻阅到的,他说,毛泽东是用蓝笔批注在全书的前八十回,批文写于书的天、地间或两侧的空白处。不几天,路工买来相同版本的《红楼梦》,经康生同意后,按毛泽东批注的位置,很细心地每个字,每一标点,包括每一个批注记号,都毫无遗漏地抄录下来。

路工先生遗憾地对我说,毛泽东批阅过的原本《红楼梦》很可能散失在上海等地。早在60年代,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将随身携带的《红楼梦》赠给当时上海的一位负责人,据说后来该书又传到石西民手中,惜乎“文革”中却“不翼而飞”,如今是存是毁仍然是一个

“谜”,而路工先生的这手抄本,竟成了十分珍贵的“孤本”。路工对我说,北京出版社有意隆重推出此书,并正在商谈中。

路工还对我说,毛泽东批阅的《红楼梦》,共有七千余字。现将部分摘录于下。

毛泽东批阅的《红楼梦》第一段出现在第一回第七节的眉头上,批文为:“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抢田夺地‘民不安生’,是造成‘盗贼蜂起’的原因,非‘盗贼’去‘抢田夺地’程本删此二句似非偶然”。

另在第六回结尾外批阅:“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起,写得很好,其价值,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一边是宁荣府,一边是小小之家”。

出现在第十七回中的批阅:“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

接下来在第十八回中的批阅是:“作者对戏曲极为熟悉,且运用自如,红楼梦与金瓶梅词话一样,书中所用剧目,不仅对当时流行之名剧,且与本文主旨切合。”

在这回结尾处:“这回奢华之至,即刘姥姥在场,亦很难计算,一次省亲,顶农民多少家多少年的费用。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日”

毛泽东在第十九回是这样批阅的:“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之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的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情恣性’。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

“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象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射出来。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

“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谏,故待之以八人大轿。

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日 中秋节记”

又:“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

(责任编辑:呈思)

我们对汪东兴这本书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读后

● 何 蜀 王年一

1997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同志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在正文前有一篇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

该书所写到的历史，是当代中国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中的一段。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21年之后，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政治结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公布16年之后出版这本书，自然应有新的“研究”，新的“总结、提高、发展”。

然而，读了这本书，却使人感到惊异与迷惑不解：在这部125000字的长篇回忆录中，不仅看不到新的“总结、提高、发展”，反而从中共中央那个《历史决议》倒退了。

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然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

争》一书中，毛泽东对这场由他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应负的主要责任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只有伟大、英明、正确的一面，只有毛泽东的“非凡的胆略和气概”；“文化大革命”中几亿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严重教训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只有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一根本错误也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却是独有毛泽东精通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而“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几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

尤为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竟将毛泽东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所作的、包含不少错误内容的讲话，不加分析、不加说明地大量引用，奉作经典。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反复强调的“十次路线斗争”。

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开篇《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的第一段,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在这一段话之后,作者没有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作出应有的说明,而只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正确。实际上,放在正文之首的这段话,就成了全书的总纲。全书正是按照“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来叙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的。

除去在正文第一段引用那段话外,书中还反复多次提到中共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比如:

第 101—102 页:“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第 106 页:“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第 109 页:“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

第 115 页:“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第 139 页:“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

第 141 页:“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

第 143 页:“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第 171 页:“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第 180 页:“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一代,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十次

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恐怕也大多再记不清当时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是哪十次了。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又并未将所说的十次都一一列举出来,这就可能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是毛泽东与错误路线或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列举一下,看看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是作者记叙的毛泽东在 1971 年那次南巡时对沿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并在以后几年里被奉作经典,要求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反复学习。按照当时的说法,在这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或“错误”路线的一方依次是:

- 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 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 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 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 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 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 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十、“林彪反革命集团”。

这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说的“十次路线斗争”。

所谓“路线斗争”的提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早已为人们所抛弃。历史已经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分歧和斗争都一概看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一概说成是“路线斗争”,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危害极大的。

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中,就曾对“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究竟拿出了一

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在谈到“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时,他又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他还否定了“罗章龙是路线错误”的提法。他严肃指出:“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对党内不同情况的争论、批评或斗争,均作具体分析,是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

但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汪东兴同志在书中却把这个已经被抛弃了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错误提法始终当成正确的教导反复引用,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和迷惑不解。

邓小平同志谈到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时严肃指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而汪东兴同志十多年后又在这本书中重新大提“十次路线斗争”,能够说是郑重的吗?

更何况,所谓“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第八次和第九次,早已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冤案获得彻底平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辞去其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得到全会批准的。

作者在书中几次引用毛泽东历数十次“路

线斗争”的讲话时,一方面照录了对瞿秋白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略去了有关第八次和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总是在讲了高岗、饶漱石(第七次)后就跳到讲林彪集团。事实上,毛泽东当时谈到第八、第九两次“路线斗争”时说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刘少奇那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

作者略去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是就表示不同意对这两次“路线斗争”的评价呢?翻遍全书,只在后记中能看到一点间接的说明。

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这模棱两可的、语意含混的12个字就可以取代书中大量地方都应有而没的说明吗?

作者是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没有对毛泽东“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应有的说明吗?不对,因为书中另有对当时“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更正性说明的例子。

在该书第138页,写到毛泽东批判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时,作者特别加了一段说明:“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同毛主席巡视南方。”

在该书第145页,写到许世友告诉毛泽东,他同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都比较好时,作者又特地加了一段说明:“在当时的条件

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杨成武为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蒙受的不白之冤,自然不能与彭德怀、刘少奇的大冤案相比。至于许世友与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如何,则更不能与“路线斗争”相提并论了。既然对这些事都专门花费了笔墨加以说明,可见作者在写作中并不是只作“尊重历史”的“实录”,而是也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对“在当时的条件下”的某些讲话加以说明的。那末,为什么却不对彭德怀、刘少奇这两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作出应有的说明呢?

与“十次路线斗争”相关联,书中还有另一些含有重大原则性错误的毛泽东讲话,作者未加应有的说明。

比如,该书还反复提到“反九大路线”的问题。

作者引用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书中所作的批示说:“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见该书第70页)

作者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见该书第92页)

还有:“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见该书第98页)

还有:“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见该书第118页)

……

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所谓“九大”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给读者(特别是今天的青年读者)的印象就会是:“九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反九大路线”自然就是“反党”。

那末,“九大路线”到底是什么路线呢?作者在书中全文抄录了他因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附和了陈伯达的发言、赞同了设国家主席而作的两次书面检讨,写于1971年4月18日的第

三次检讨书中说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见该书第81页)

在这里,作者说得比较明确了:“九大”路线就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若单从字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自然是很好的。但是这句口号是毛泽东在“九大”上提出来的,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九大”上要求的所谓“团结”是什么意思呢?“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这时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批判的老干部搞好团结,二是要已经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就暴露出了矛盾的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搞好团结。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这个“团结”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有害而无利的。

所谓“争取更大的胜利”,首先得看“九大”已经取得的是什么“胜利”。在“九大”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经毛泽东审定的政治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召开的,这个“胜利”就是“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要在这样的“胜利”基础上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会是什么好事情吗?

既然“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那末“反九大路线”岂不是正确的了吗?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九大路线”,又该让人怎么理解呢?

在该书中还不加说明地多次引用毛泽东讲话，称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是“反革命的”，指责当时北京军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在称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林彪集团的“五位大将”的同时，将李雪峰、郑维山与之并列称为“两个大将”，把撤销李、郑二人的领导职务、改组北京军区的作法说成是“挖（林彪集团的）墙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华北会议》辞条里已经说明：“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虽有正确的一面，但列举的种种‘罪行’，有许多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虽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中央已于1979年12月6日为之平反。”此外，中共中央在1982年4月1日为李雪峰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中，已同时为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平了反。

既然是中共中央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作出过平反决定的人和事，为什么作者不加任何说明呢？

作者在书中对许多这样应作说明的地方都未作说明，为什么又对个别事件（如对杨成武与“大树特树”文章）作了更正性的说明呢？是不是因为杨成武的冤案是毛泽东生前已承认搞错了，决定平反，而对其他人与事的错误评价，毛泽东生前没有表示应予平反呢？是不是还有“凡是”的观念在制约着或影响着作者的写作思想呢？

作者在所记叙的事件中是重要的当事人。在该书中，作者用了三页多的篇幅记叙九届二中全会大会开幕之前于1970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者列席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该书详细记叙了谁先发言，谁后发言，甚至连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这样的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只字未提有关“设国家主席”的讨论。

然而，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第386—387页里，却有这样的记载：

“8月22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纲领”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却回避了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以外全都赞同设国家主席的发言。这能说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吗？像这样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加以剪裁从而误导读者的地方，书中还有不少，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汪东兴“如实写出来”的叙述中回避重大的历史事实，并将毛泽东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过的错误评价不加任何说明而当作伟大领袖的英明教导大量引用，这样作，又怎么谈得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呢？也更说不上是对研究历史的“总结、提高、发展”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一个向蒋介石争来的苗族国大代表

——记著名苗族民族学家石启贵

● 陈浩望 周世伟



石启贵

1937年，国民党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名额时，蒙、藏诸族设有240名指定代表，而在全国分布极广、人口众多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竟一个代表名额也没有。为了确保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权益，大家一致推举湘西有一定声望的石启贵代表苗族等少数民族给国民政府上书。石启贵应大家的推举向国民政府呈述：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享有同等权利，可是有史以来都没有资格参加研究和管理国家大事……苗民等土著民族历受政治经济压迫，千百年来不堪言状，以无人代表参政之原因，故得不到均等享受之利益。强烈要求分配给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

信呈上后，蒋介石表态：给全国土著民族额定代表十名，其中湖南一名。就这样，1946年11月，石启贵

以湖南土著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竭力办好苗区教育

石启贵生于1896年12月，世代务农。12岁进了汉族的私塾，后考入了湖南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了湖南群治法政大学。在省城求学期间，正值我国思想界和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从小就生活在贫穷落后和“民族牢狱”的石启贵，对当时的民主潮流和实业教育接受很快，决心学习新科学，掌握新思想，为改变湘西的落后面貌而出力。他大学毕业后，竟当掉家里的三十挑谷的水田，用其所得资金，到上海和武汉等通都大邑实地考察，参观游学，他学会了照相、织袜、养蚕等多种技术，并购买了织袜、卷烟机和照相机，还买了水稻良种和杭州养蚕学校的优良蚕种“阳桑”等，带回湘西。

协助蔡元培开 垦民族学处女地

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我国民族学先驱蔡元培委派凌纯声、芮逸夫两位专家，到湘西开垦民族学处女地，石启贵被邀请协助工作。石启贵工作积极主动，常为专家出谋划策，凌、芮二位专家一致认为石启贵“深悉苗乡情俗，精摄影技能”、“对苗族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是个难得的人才。蔡元培十分高兴，大加赞赏，立即命凌、芮二人在离开湘西前，将所有应调查的事和全部调查任务，交请石启贵代理。石启贵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凌纯声、芮逸夫的具体指导下，正式走上了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的道路。石启贵不畏艰险，常只身出入苗岭山乡调查研究。他脚穿草鞋，手持竹杖，顶风冒雨走遍了湘西和贵州省的松桃、铜仁等县。他到县府、乡府找官绅苗王，拜访寨主；诚心诚意向他们求教。

石启贵在调查苗情、记录苗俗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搜集、记录揭露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启发苗民阶级觉悟的篇什，例如他采写的《兄弟民族三字歌》：

三字歌，意义深，讲的话，句句真。财主们，是祸根……刮民财，银斤斤，衣食住，俱丰盛。吃山珍，穿罗缎……我苗家，苦命人，没饭吃，没钱用。没衣穿，赤脚行，世代代，受欺凌。月亮落，太阳升，何年月，得翻身……

石启贵记录的苗家情歌，既表现真挚的爱情，又表现了藐视王权的精神：

青年月下共徘徊，
男女情浓丢不开。
夜半歌声犹未歇，
悄言明晚早些来。
铁打链子九十九，
哥缠颈妹缠手。
哪怕土司王法大，
出了衙门手牵手。

石启贵采集的《苗家竹枝词》反映了苗乡的生产、生活等情况，是一幅又一幅生动的民族风情画——

春耕

南风习习日初长，
男出耕田女插秧。
送饭人来耕未已，
垄头一带尚闻香。

秋获

黄云一片垄头横，
八月秋风打稻声。
料得农家应不远，
有人担荷向前行。

· 渔猎

池塘新涨水涓涓，
草色遥看近更鲜。
试问苗家何事乐？
捕鱼猎兽弋飞鸢。

纺织

纺纱织布一般同，
农事方休重女红。
最是篝火残夜里，
声声互答过房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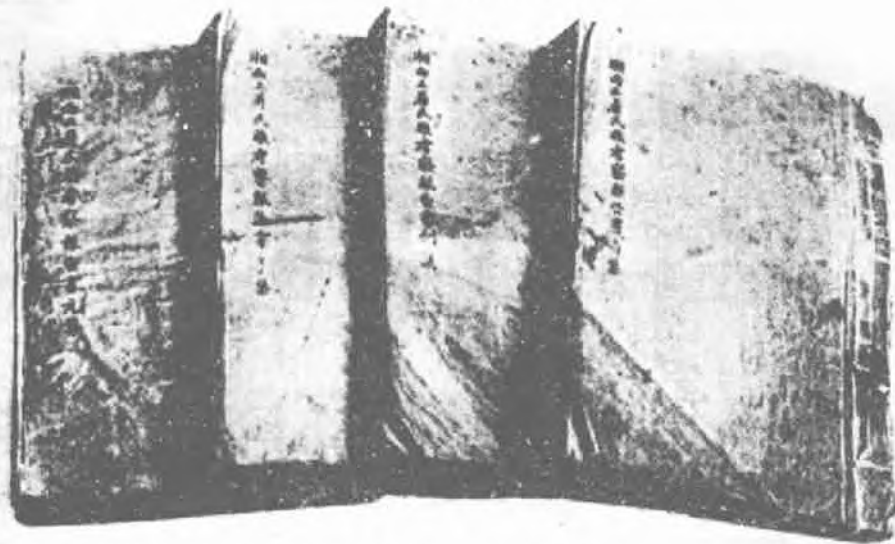
服饰

银窠高耸项围圆，
花帕红绳正斗妍。
八尺布裙遮不住，

他先是受聘于乾城模范小学和女子小学任教，一面又指导家人开垦荒山，种植蚕桑，试种良种水稻。与此同时，还积极组织乾城县苗民文化经济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该会的常务委员。

为了培育苗族的后代，他走村串户进行家访。省教育厅委任石启贵为“湘西苗族教育劝导员”，负责抓湘西苗族教育事宜。为了培养适应湘西建设需要的人才，石启贵因地制宜编写了乡土教材，向学生介绍湘西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情况，教育学生热爱湘西，立志建设好湘西。规模不断扩大，学校越办越好，培养了不少师资，受到湖南省教育厅的赞许。不久，湖南省教育厅发文将特区师资训练所改为湖南第九师范学校，设有简师、高师两部。

在抓好教育培养建设湘西人才的师资的同时，石启贵还十分重视发展、传播苗族文化和发现苗族文艺人才。1937年春，石启贵从各地苗乡挑选了20多名苗族民间艺人，组成了湘西苗族文艺团体，于同年4月间到达行署所在地沅陵，演出一个多月。



石启贵1940年所撰写《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手稿本

一双赤脚似飞仙。

山寨

万山深处苗人家，
十里长亭石磴斜。
黄土筑墙茅盖屋，
客来莫辨路三岔。

路情

苗女如云耍岁新，
路旁山畔戏风情。
公然调笑公然唱，
不计生人与熟人。

苗民信鬼求神成俗，遇灾祸，患疾病，常常酬鬼禳神，让神鬼来消灾解难。苗家信奉的神灵很多，一般称谓为36神72鬼。石启贵为了记录酬鬼禳神的具体实况，他常常到现场去观看，为了记录神符咒，他走遍二百多个村寨，访问了两百多巫师，记录分析了苗魂神辞100多种，长达3000多行。如椎牛、椎猪、接龙、祭家先、祭雷神、天王神、解天狗……每祭一种神，都有一连串的唱辞。如接龙神、就有起场辞、请龙辞、安龙辞……每段唱词五六十句、三四十句不等。这些记录，是研究古代苗乡历史、民俗的“活化石”，是非常珍贵的文史资料。

苗乡盛行“还傩愿”的仪轨。傩神是苗家敬奉的神灵之一，“还傩愿”多在秋冬进行。此时，亲朋道贺，麇集如云。酒醉茶余之后，于夜间唱歌，由扮演傩神的艺人演戏。石启贵把这些傩歌词、傩神戏文都一一记录下来。为了采访的方便，亲自参加“还傩愿”活动，往往通宵达旦。他记录整理的傩歌戏曲、歌词达十余本。

石启贵的苗乡调查还很注重去伪存真。

有这样一种民间传闻，说是有的苗家妇女每当丈夫外出时，担心丈夫有外遇而不归，便在酒饭里暗中放一种叫“蛊毒”的药（会此道者，名草鬼婆。传说此药的配制方法是：将毒蛇、蜈蚣、蝎子、月经带及几种有毒的草药混放在一个木

桶内，任毒蛇、毒虫互相撕咬，取最后存活者烧压成粉末而成）。男人服下这种药末后，妻子便根据药量的多少暗示，多长时间内（例如三个月、半年、一年），必须回家。否则，必死他乡无疑。男人们心里明白，按时回归，妻子在饭菜中暗放解药，吃后平安无事。这种传闻给苗家外出谋生的男子蒙上一层阴影，也给苗家妇女造成很坏的影响。有的丈夫外出暴死，不管事实怎样，往往被认为妻子放了蛊药。

为了查清是否确有“草鬼婆”下蛊药的事，石启贵深入村寨，推心置腹，细问苗妇数百人，均言“不会下蛊，没有此事。”石启贵在取得充分的证据后，否定了“草鬼婆”下蛊药的古今传闻。

石启贵对苗情的调查研究，内容非常广泛，除前述外，还有苗乡的人口、交通、名胜、矿藏、历史、事变、世系、家族、嫁娶、生育、丧葬、工匠、狩猎、医药、贸易、社交礼节、岁节团欢、鸟虫技艺等等，包罗万象，简直是一部关于土著民族的百科全书，是今天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苗族进行研究的资料宝库。

积历年的调查研究成果，石启贵在1940年编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全书共80章，

460节。

1949年长沙解放，石启贵回乡务农。1951年，中南区兄弟民族访问团来县时，他受聘为顾问，协助调查访问团深入苗乡访问，他为访问团提供了大量土著民族的资料。编写了20多万字的《湘西兄弟民族介绍》书稿，贡献给人民政府。他还向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南民族学院调查组、湖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等好些单位提供了湘西苗族的有关情况，每次给的材料都写得详细具体，很有价值。他欣闻中央要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便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苗族语言的研究上来。他先后写成了《民族速记学》、《速记讲义精详》、《苗汉训练学》、《苗语初析》、《苗语法解》、《苗文草则》、《苗语声韵学》、《苗族歌韵大全》、《苗汉名词会通》、《解放民歌集》等文稿。

为了使石启贵沉睡数十年的遗稿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1982年，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吉首市档案馆商定，将以上书稿整理出版。

石启贵病逝的时间是1959年5月，享年63岁。

（责任编辑：仲文）

邮购启事

凡刊延误订阅的读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4.80元。补购或预订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本刊现仅有1997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4元，简装每套49元）及少量1996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2元，简装每套49元）。创刊至1995年历年合订本早已告罄，欲补单刊者，请来函说明所缺期号，若有存书当即寄去。以上均免收邮寄费。

另，本刊自1994年——1997年每年出版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至4期均有存书，每册包括邮费9元，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刊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 2425 或 64031144 转 2004

联系人：谷世章

北大的校格与蔡元培的人格

● 靳树鹏

北京大学前五十年以 12 月 17 日为校庆日，后五十年以 5 月 4 日为校庆日。大概因为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北大也因五四运动而声誉大振，可惜有考据癖的胡适也没有把北大生日考证得很清楚，据陈平原考证，北大的真正生日是戊戌年 11 月 18 日，即公元 1898 年 12 月 30 日。

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时，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紧急征稿，写了一篇《我观北大》，提出北大的校格问题。“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今天有人把北大的校格概括为“独立”与“自由”、“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利”。北大的这个校格与蔡元培的人格不无关系。

蔡公的人格魅力在于他一生不为强权所屈服，始终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自由的学风。

曾任过北大校长的，大概没有哪一位的声望能比得过蔡元培。蔡以后的校长中，大概以胡适最为闻名。在北大的历任学长中，也没有哪一位的贡献和名气能比得过陈独秀。

蔡元培以后的北大校长太多，举不胜举，且看看蔡以前的：清廷任命的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是孙家鼐，咸丰状元，光绪的老师。经孙举荐任许景澄为大学堂总教习，许是

同治进士。后又任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也是同治进士，并加派张之洞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张百熙曾礼聘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是桐城派古文家，也是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不料他从日本回来不久就死了。清廷垮台，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袁世凯任命严复为校长。以后的北大校长还有何燏时，胡仁源。所有这些管学大臣、总教习、校长，无论是清廷任命的，还是袁世凯任命的，多是学界的第一流人物，也都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努力。袁世凯死后，蔡元培从欧洲归国，不久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

在中国近现代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林琴南用小说影射诋丑蔡元培是个别现象），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蔡元培固然是有着菩萨心肠的忠厚长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在新旧思潮较量中，在政党斗争中没有倾向性，其实他在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1868 年生。在清末做过翰林院编修。他 1902 年游历日本归来后，被推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长，辛亥之役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对支持学潮的陈独秀、蔡元培等十分不满，拟罢免蔡的北大

校长之职，蔡闻知后主动辞职，悄然离京。但学界和舆论挽留蔡校长的呼声越来越高，北京政府的国务院教育部不得不电促请他回来主持校政，四个月后又回北大。1923年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卖身投靠官僚，蔡元培愤然辞职，随即离京。北大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开会决议，除蔡校长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不降志，不辱身”，以辞职与反动政府斗争，在学界和舆论界的支持下，政府又不得不挽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大概没有如蔡元培者。1927年，先是“4.12”蒋介石在上海政变成功，后是“7.15”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得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投入血泊之中，蔡元培在这件事上却帮了蒋介石的忙。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在上海召开，蔡被推为主席，吴稚晖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获得通过。4月2日蔡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文告。4月9日，蔡又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三天后蒋介石就向共产党举起屠刀。事后中共把积极主张清共的吴稚晖骂得狗血喷头，对蔡元培却很少谴责。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接着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篇悼念文章。前中共领袖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写道：“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延安各界也举行追悼大会，报上也发表悼念文章。中共派廖承志，国民党派许崇智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蔡先生执绋者五千多人，后安



蔡元培

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蔡元培一生追求革新进步之事不胜枚举。他在1917年把陈独秀引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就是他整顿改革北大、提倡新思想的重要举措。陈独秀既没有在高等学府教过书，也没有教授博士头衔，如果科举的成绩也算一种文凭的话，他也只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在官场上一文不值。守旧派反对蔡校长的此项任命。他们说，陈先生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教书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元培针锋相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十多年前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凌厉锐气和刻苦精神就令他感动不已，今天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更令他佩服。确实，从本世纪初直至今天，哪一种杂志可以同《新青年》媲美呢？他对陈独秀的赞美是由衷的。十年后的1927年，他对陈独秀的人格学品照样赞许，他所以选择了蒋介石，大概他认为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消灭军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或有此能力，而陈独秀及中共尚无此能力。但他很快就看出蒋介石的独裁真面目，曾说“蒋介石是袁

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他对蒋政权也采取了不合作主义，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廖承志、许德珩、胡也频、丁玲、潘梓年、李少石等活动。他为李季的《马克思传》、沈嗣庄编的《社会主义新史》、《鲁迅全集》等书写序。当时国民党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蔡的这些序文正是对蒋介石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挑战。他还为《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为营救陈独秀、牛兰，他曾受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警告。1928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提出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此后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监察院院长，他也坚辞不就。

他博大的胸怀，突出地表现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上，他写道：“各国大学，



胡适

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还写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曾听过蔡元培的讲演，他笔录并以《蔡子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为题发表在南开《敬业》上，其中蔡元培说：“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仅蔡元培这三段话，足令一切文化专制主义者和学术霸权主义者自愧弗如了。蔡元培主持北大后，正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新兴起，他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瑛作理科学长，震动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热烈拥护。此外，李大钊、创逻辑学名的章士钊、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等，都是他请进北大的。他还把既非旧派也非新派，年仅24岁的梁漱溟引入北大教席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与胡适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北大学生曾做柏梁台体诗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当时的北大真的是百花齐放。

胡适是陈独秀推荐经蔡元培批准到北大任教的，胡对蔡有知遇之恩。蔡元培旅欧期间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1921年写出《红楼梦考证》，其中很大篇幅就是对蔡著《石头记索隐》的批驳。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胡还说了些过头话，如“很滑稽”，“笨谜”，“大笨伯”等。胡将《红楼梦考证》送给蔡，蔡回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严谨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后来蔡在《石头记索隐》第六

版自序中对胡适的批驳提出商榷。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再做一篇跋，和他讨论一次。”胡在跋中表示“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于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一个青年教授，初露锋芒就向德高望众的校长挑战，且不说蔡先生的雅量，这样自由的学术风气能不令人向往吗？历史证明，正是胡适推倒了旧红学开创了新红学。

蔡、胡经过这一次学术交锋，彼此并未产生隔阂。翻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的近150万言的《胡适书信集》（三卷）中胡致蔡信，可知这以后蔡仍常以胡适为倚重，胡几次坚辞大学委员会委员、第一国语模范学校校董、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蔡均坚留不允。胡也几次将学校有关事宜向蔡陈述请示，在朋友间尊称蔡为“子丈”。在胡致蔡的这些信中，如他自己所说，或作披肝沥胆之言，或作狂妄之言，或作憨直之言，可见他对蔡的尊敬和信任。胡也是劝蔡辞掉代司法部长之一人，他在信中说“司法部之事，外间皆谓先生代人受过，似可以及早辞掉”。关于蔡辞不辞职察院院长事，胡在信中写道：“近来知道先生不曾辞掉监察院长的名义，但事实上仍不管监察院组织进行的事。我对于这事，还想对先生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今日政府清明枢纽在监察、考试两种制度的实行。考试之事，暂且不谈。监察之事实不容再缓了。政治的腐败非此不能矫正，人民的苦痛非此无从伸诉。……先生在今日似不能不有一个明决的态度。如先生真认监察为无可为，则宜毅然求去，不可仍居其名，而以一个重要制度的创设大事付于三数无忌惮的政客之手。先生如真感觉身任党国之重，良心上不能脱然而去，则宜积极任事，把监察制积极筹划实行起来，在开始之日，提起一两件大参案，使人民的耳目一新，使贪官污吏的心胆一震，使世界人士的视听一变。……国家无监督政府之机关，则人民将厌恶政府，鄙弃政府。……国家无监察吏治之机关，则不但恶人敢于为恶，即平常可与为善的人亦不能不为恶习惯卷括而为恶。”应该说这确实也是胡适的肺腑之言。这期间他们的分歧也不少，涉及的事情也较复



文科学長陳獨秀先生之像

陈独秀

杂，不及叙说了。

蔡先生与周养浩女士1923年结婚，伉俪情深十七载。周女士在巴黎学过油画，其家蔡先生的一张油画像就是她画的。她也善中国书画，并常与蔡先生唱和，她的和诗有一句是“天荒地老总不磨”。1939年在香港时，正值周女士五十寿诞，蔡先生特作祝寿诗：“邛屨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春到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周女士是绍兴周家人，她病逝后周建人发来唁电。周女士虽有才学，但并非名人，但她大殓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里挤满了学界名流，其中有我国生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冯德培等。人们既是在悼念周女士，也是在缅怀先逝的蔡先生，更是在悲挽蔡先生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光辉时代。这样的感慨不无道理。

（责任编辑：刘家驹）

阳早、寒春

献身中国农业的美国人

● 武际良

北京市昌平区小王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试验站工作的一对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他们都是接近耄耋之年的人，来华工作已经半个世纪。他们仍然在为中国的农牧业机械化艰苦奋斗，为发展中国奶牛事业默默劳作。今年初春的一天，我到小王庄访问了他们。

“红星照耀” 阳早奔赴延安

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矿工家庭。1936年，阳早先进伊利诺斯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后又转入康奈尔大学畜牧专业，半工半读。在大学期间，他和比他高一班的韩丁（威廉·比尔·辛顿）同住一室，十分要好。他们都关心时事，当他们读到新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时，中国红军英勇长征的故事震撼了这两个美国青年的心，在他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945年韩丁来到中国，两次会

见了正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并谈了话。韩丁返回美国后，把他会见毛泽东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阳早，促使阳早更加想到中国去。

1946年3月，阳早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他以奶牛专家的身份来到中国。同年10月，由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帮助，辗转到达延安。他立即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国营农场——光华农场的工作。尽管解放区物资匮乏，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是一个崭新的社会。阳早愈住就愈不想走了。他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未婚妻寒春，盼望她也尽快到延安来看看。

寒春要牛奶 不造原子弹

寒春，原名琼·辛顿，是韩丁的妹妹，1921年10月20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得知德国法西斯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时，美国立即集中一些原子能科学家加紧研制原子弹，

其中就有寒春，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核物理女科学家之一。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把这两座城市变成了废墟，炸死了十几万平民百姓。这使寒春作为一个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人类的科学家的良心受到极大的伤害。1946年春，她同其他许多科学家一道赴华盛顿，抗议美国政府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她和一些同事把在美国洛萨阿罗莫斯附近沙漠中试验原子弹爆炸高温辐射溶化了的沙砾取来，制成了几十个标本。他们到美国一些城市作巡回演讲反对制造原子弹时，每到个城市就送给市长一个标本，告诉市长：如果你的城市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1947年，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的寒春，收到阳早从延安寄给她的书信，她毅然舍弃了所钟爱的加速器，于1949年3月，来到中国延安。

在窑洞里，寒春和阳早喜结良缘。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林伯渠送给他们一幅喜幛，上书：“真理和爱情的结合”。还有一位同志赠他们一首贺诗写着：“让光明早临人间”、“寒凝大地发春华”。他们从

中取其意，各自取了中文名字“阳早”，“寒春”。

1952年3月，我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等人共同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寒春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她在会议上作了“科学要为人类和平服务”的发言。这一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的一些报刊大作文章，造谣说寒春把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了中国人。还刊登漫画，把寒春描绘成一个拿着小本子正在偷偷地记录原子弹秘密的女“间谍”。寒春十分愤怒，她立即写信向美国科学家联盟发表声明，指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恶意诽谤；她告诉美国人民，她正在帮助中国人民搞农牧机械化，饲养奶牛，让中国的儿童都喝上牛奶。她的这封信，以《中国要和平》(China Wants Peace)发表在英国的报刊上。

寒春在美国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工作时，曾同华人核物理学家杨振宁同在一个研究小组。1971年夏天，杨振宁回国探亲时，他曾向老同学、中国核科学家邓稼先询问：“是不是美国人寒春参加了中国研制原子弹？”邓稼先向周恩来总理就此事作了汇报。周马上指示他，如实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研制原子武器，除初期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1972年冬天，美国女作家，《续西行漫记》的作者海伦·斯诺到中国来访问，专程到北京郊区红星公社去看望阳早和寒春，她在美国的报刊上曾看到有报道说，寒春在新疆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工作，现在她亲眼看到寒春在这里养奶牛，而且干得兴致勃勃。

阳早在战火中 转战陕北、华北

1947年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

的精锐部队矛头直指延安。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在陕北高原上与敌人周旋。

国民党进攻的隆隆炮声，已经隐约可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百忙中会见了当时正在延安访问和工作的几位美国朋友斯特朗、马海德、李敦白和阳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意阳早等年轻力壮的朋友留下来，随所在单位一起转移。

当时陕北战场的形势十分严峻，胡宗南20多万大军在疯狂进攻。阳早和光华农场的几十个职工，赶着几十头荷兰奶牛，在陕北高原千山万壑中奔波，有时顶着烈日长途跋涉，有时冒着风雨彻夜行军，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巧妙地和敌人兜圈子，保护着几十头奶牛的安全。9月，阳早又东渡黄河到达华北解放区。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延安，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阳早和农场的职工一起回到了陕北。



出生不久的小奶牛是寒春的好朋友

建设新中国 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

全国解放后，阳早和寒春没有到大城市去，而是留在了经济落后、生活条件艰苦的陕北高原。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们夫妻始终战斗在农业战线的前沿阵地上。先是在瓦窑堡农具工厂，他们和中国工人一起收集美国制造的炸弹碎片，熔铸出陕北农民急需的铁锹、铁镐、犁头和镢头。阳早还设计制造了提水机械和四轮马车，寒春设计制造了风车和翻斗车，他们为新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点燃了星星之火。

不久，阳早和寒春在得知解放战争时期保留下来的几十头荷兰奶牛，已经到了陕北定边县，他们便自愿到那里定居和20多个职工一起创建了三边牧场，饲养奶牛和细毛羊。他们还帮助当地牧农改良牛羊品种，为牧民的牲畜治病、防



作者和阳早、寒春夫妇

疫。定边和蒙古毗邻，经济十分落后，生活十分艰苦。阳早、寒春和中国职工一样，过着供给制生活，夏季一套单衣，冬天一身棉袄，一天吃两顿小米或黄米，一周才能吃到一顿粗面馒头。阳早和当地牧民一样抽旱烟。冬天屋里达到摄氏零下十几度，他们用羊毛捻线织毛袜和手套来御寒。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还珍藏着这些羊毛线织的手套和袜子。

1955年，阳早和寒春又来到渭河之滨的草滩牧场，负责奶牛生产的科技工作，一干就10年。他们在一片荒草滩上艰苦创业，建立起新的奶牛场。在她们和牧场职工们的努力下，奶牛发展到1000多头，还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不少优良种牛。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组织上决定阳早和寒春吃粮不限量，并可全部买细粮吃。她们却坚持吃同中国的干部一样的定量，并按比例买粗粮。她们的孩子饿了，就拿红薯干、萝卜充饥。

1966年初，中国政府考虑到他们都已年近半百，将他们调到北京，分别在中国对外文委图片社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英文

改稿工作。起先他们被送进高级宾馆，住专家楼，出门坐小汽车，他们提出要求住到所在单位的职工宿舍，和中国同志生活在一起。但是离开了牧场，离开了奶牛，离开了朴实勤劳的中国农牧民兄弟，他们怅然若失。因为他们在美国呆的时间越久，就越感到农业、农民、农村这些字眼对于解决十二亿人民的温饱问题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农业搞不好，中国的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领导上请求重返农业第一线。

1972年以后，阳早、寒春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红星公社北牛场工作。她们又和奶牛朝夕相伴，这里的工作条件很差，出门要骑自行车，做饭要生炉子，但她们觉得如鱼得水般的自由，热情洋溢、勤勤恳恳地干起来。

1975年，阳早第一次返回阔别了近30年的美国。在两个月里，她走访了25个城市，举行了多次演讲会、座谈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1977年，寒春应美中友协和加中友协的邀请，先后到美国54个城市和加拿大的3个城市，举行了上百次演讲会、座谈会。

1979年10月，阳早和寒春被

国务院聘请为农业机械部顾问。11月，他们就组织北京、西安奶牛场的12名干部、工人、科技人员赴美国考察、学习奶牛饲养机械化技术。在40多天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参观学习活动中，她们在美中友好协会的帮助下，把12个人分散安排到美国朋友家里吃住，一次旅馆都未进，节约生活交通费四分之三。她们用省下来的差旅费购买了技术设备和冷冻种牛精液。12月回中国后，她们又赶到上海，参加全国工厂化养鸡、养猪学术会议。住在锦江饭店，她们坚持在伙食标准最低的中国工作人员的食堂用餐。在上海紧张地工作了10天，并对上海郊区县牧场的生产和管理提出自己的建议。当一家报纸请她们为读者题词时，她们却一口谢绝了。之后，寒春回到她生活过十年的西安草滩牧场，同职工吃住在一起，共同研究设计鱼骨式挤奶台。她们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鱼骨式挤奶台诞生并投入生产，在提高牛奶产量、质量，防止奶牛乳房炎和降低能耗等方面显示了优越性。1980年，寒春帮助上海研制成功了直冷式奶罐，为当时国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982年以后，阳早和寒春还用了六、七年时间，研制了一套从切割青贮、饲养牛群到挤奶、储奶、运输、清粪的成套机械。

1983年夏末秋初，农机部副部长项南邀请阳早、寒春到福建休疗养。但是他们根本闲不住，整天往农村跑，走到哪里都大谈中国的农业机械化。

1986年12月，阳早和寒春作为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第一批领到在中国永久居住权证书。1989年，为表彰她们在中国工作40年的功绩和贡献，中国政府向她们颁发了“国际科技合作奖”。199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感谢寒春为上海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授予她“白玉兰荣誉奖”和白玉兰荣誉奖章。

“梁山伯、祝英台”本事考

● 浩望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流传得最广泛的一个民间故事。在地方戏中，几乎每一个剧团中都有这一出看家戏；往往演别的戏卖座衰落的时候，就搬出“梁祝”，顿时吸引观众纷至沓来。

“梁祝”的本事，考之浙江鄞县志，与地方戏所演出的颇有出入。志载：县西十六里的接待寺西，有义忠王庙，一名梁圣君庙，祭祀东晋鄞令梁山伯（鄞县在东晋时名鄞县）。安帝时，刘裕奏封梁山伯为义忠王，令地方官立庙。宋代郡守李茂诚撰“庙记”，称之为神。其所以称神，却有一段神话，说是海寇孙恩犯会稽时，大尉刘裕往讨，山伯托梦刘裕相助，夜间烽燧荧煌，兵甲隐见，孙等大惊，即入海逃去。至于与祝英台同化蝴蝶的话，更是与“庙记”无关。

据“庙记”说：庙神名处仁，字山伯，梁姓，会稽人，他的母亲梦见太阳贯穿胸怀，怀孕十二月，在东

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年时聪明有奇气，长而就学，最爱坟典，曾从名师进修。过杭州时，在路上遇见一位青年，容貌端正，长身玉立，带了行李上渡船，坐在一起；山伯问他姓名，他回说姓祝，名贞，字信斋；问他从哪里来？说是来自上虞乡间；问他往哪里去？说是去求学。双方讨论学问，很为相得。于是两人欣然同行，合从一师，同学了三年。后英台因思亲，先行回乡。过了二年，山伯到上虞访祝，遍问祝信斋其人，竟没有认识的；却有一位老者在旁笑道：“我知道了，能文章的不就是祝家九娘英台么？”山伯当下找到祝家，方知同学是个女子。别后重逢，十分欢洽，饮酒赋诗，珍重别去。回家之后，思慕英台才貌，稟请父母去求婚，谁知英台已许配鄞城庙头马氏。好事不成，山伯长叹道：“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婚姻事，又何足道！”后

来简文帝举贤良，山伯应召，被任为县令。不久患了重病。病危时，对左右说“县西清道源九龙墟是我的葬地。”说完，就瞑目长逝了，年纪只有22岁。郡人依照他的遗言，将他葬在清道源的九龙墟。明年暮春，英台嫁马氏，搭船乘流西来，突遇大风浪，船竟不能前进。问篙师，篙师回答说：“这里有山伯梁县令的新坟，莫非墓中人作难？”英台听了，忙到坟前去拜奠，哀恸之余，坟地裂开，英台纵身跳将下去。侍从慌忙拉住她的裙子，裙幅却像云片般飞散了。郡人将此事上奏朝廷，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冢，勒石江左。清代李裕有诗咏其事：

冢中有鸳鸯，冢外唤不起，
女郎歌以怨，辄来双凤子，
织素登云丝，朱旒翦花尾，
东风吹三月，春草香千里，
长裙裹泥土，归弹壁鱼死。

（责任编辑：刘文）

阳早和寒春是机械工业部的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他们把自己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生活费和寄一些给带大他们的3个儿女的老保姆外，余下的都换成美元积攒起来，购买国外的先进设备和优质牛冷冻精液。有一次，他们动用了2万多美元，购买了挤奶自动计量装置。机械工业部为阳早夫妇配了一辆桑塔纳小汽车，但寒春在70岁以前，总是骑自行车去部里办事或进城。小汽车成了试验站和奶牛场的公用车。

寒春外出工作，常常是自己带饭吃。有一次去天津，她带了两个馒头、两个鸡蛋、两个苹果当午餐。吃饭时，她分一半给汽车司机，司机说她去饭馆吃面条，寒春说：“你去吧，我就吃这个。”

阳早、寒春的住房是试验站的职工宿舍，一排数间砖瓦结构的平房。他们的客厅兼办公室和餐厅，没有高档沙发，桌椅橱柜大多是公家过去配发的旧家具，椅背上还印着“试验站”的字样。他们使用的工作台，竟是自己动手用砖头垒起来铺了一张桌面。他

们并非买不起一张工作台，这完全是运用力学原理创作的一件艺术品。

阳早、寒春年事已高。阳早作过心脏手术，戴着心脏起搏器生活，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领导为照顾他们，在北沙滩给他们分配了一套四间的住房，他们不去住。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这般辛劳地工作时，寒春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用一句十分朴实的话回答说：“我们吃了中国人15000斤粮食，给中国人干点事还不应该吗？！”

（责任编辑：陆迈）

安子介与香港《基本法》

● 吴跃农



安子介

1997年7月2日，是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第二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总督府举行仪式，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安子介、霍英东等12位对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香港知名人士颁授大紫荆勋章。

在1984年至1990年起草香港基本法的7年时间中，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至1997年7月1日的13年香港过渡时期，安子介不知跑了多少次香港—北京，北京—香港，安子介把他的聪明和才智，写进了香港回归祖国、实现“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的历史新篇章！

有人说，安子介是个谜，要看清安子介不容易，因为他太丰富了。

安子介在辛亥革命第二年的1912年6月26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籍是浙江定海。这个地区的人们自古以来就从事航海业和远洋贸易，安子介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满世界跑，曾经从海参崴带回来一些俄罗斯的茶壶给安子介，上面的俄文字引起了安子介的兴趣，安子介很小就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安子介青少年时代的梦想就是成为语言学大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保持浓厚兴趣，刻苦钻研汉语，在

上海教会学校芳济学院读书时，他学了英语、法语和日语，以后，又自学了德语和西班牙语。

他在翻译了美国科幻小说《陆沉》后，又翻译了《间接成本之研究》等经济著作。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安子介来到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香港沦陷，安子介辗转到了大后方重庆，写出了受到马寅初好评的著作《国际贸易实务》。马寅初称该书“说理透彻，罗材广泛”、“足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之间一良好桥梁”。1948年，安子介重到香港建立了的纺织业，到1969年，以安子介为主席的南华实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成为香港和东南亚纺织、印染、制衣和毛纺织联合企业中的龙头老大，属下有二十多家工厂，产品销售全世界。

安子介在香港还是和记黄埔、九龙汽车、香港电视、上海商业银行、邵氏兄弟影业、海南发展等大公司的董事。

他在商业活动之余，对语言的研究亦成果硕然，著有《解开汉字之谜》、《劈文切字集》和《安子介现代千字文——启蒙篇》和《安子介现代千字文——书写篇》等专论著作，受到汉语言界好评。

安子介对汉字有着执着的研究兴趣，在他看来，汉字创始于中华民族的农业时代，许多汉字都浸透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他是从中国人活生生的生活经验来研究汉字情趣的，他认为每个汉字都是一幅图画，安子介最得意的是这么几个字例：

“香”：稻（禾）在太阳（日）照射后，散发出宜人的气味。

“卯”：状如半开的门；以此借喻农夫推门出耕的晨光——卯时。

“卵”：卯字中加两个圆点，意义扩展，借喻母鸡于卯时生下的蛋。



安子介(右)周南(中)包玉刚(左)在香港庆祝香港基本法制定成功

“字”：“子”（婴儿）在“屋”里受到父母的保护，免受敌人或猛兽的侵害，得以生存并传宗接代，以此借喻可以代代相传的文字。

“疑”：表示一个故事，是用匕首，还是用弓矢，抑或是拔足就逃呢？表现出种种踌躇的心情。

他在香港任贸易发展局主席，遍访五大洲，萌生了向外国人介绍汉字的念头，如《解开汉字之谜》一书，就是安子介用英文写的，专门向外国人介绍汉语的魅力，全书五大册，三千二百多页，是安子介用三年业余时间写出来的，是年他近七十，其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这套著作，在英国、日本和新加坡销势非常好。

安子介还为汉字更便捷地输入电脑而努力研究。1984年，他和留学英国、从事电脑硬件研究的长子安如磐合作，创造“安氏汉字电脑编号”汉字输入法，在此基础上，又推出“安子介写字机”，并在我国申请专利。这部写字机能用中、英、日、法、德、俄、葡、西和希腊九种文字，且非常轻便，安子介充满深情地说：“二十一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

60年代初，香港的纺织品出口遭受英、美的夹击，境况艰难，1961年，安子介出任欧洲共同体香港代表团的成员，为了开拓香港的纺织品出口，他前往英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游说，曾创下十七天睡了十三张床的记录，精诚所至，终于打破

僵局，使香港的纺织品走进了欧共体的市场。从60年代到70年代，他已是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为建立香港的繁荣和对外贸易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他几乎粗通西方七国集团的语言，又有很强的外贸专业知识和经验，在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时更显得非常自如。1975年至1979年，在他担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期间，他筹划了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的一系列大动作：调查国际市场访问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贸易博览会和在国外举办香港商品展销会，为确立香港出口产品的国际声誉立下汗马功劳。

80年代，安子介原准备退下来，静心研究汉语言，然而，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把他推上更为壮丽的历史舞台。1983年，在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关键时期，他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常委，自1985年开始起草基本法起，安子介就被委以重任，既是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又是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参与了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邓小平六次接见了她。

安子介在回顾这13年的过渡时期的工作时，感慨颇多，他说：“事实上，这就是‘一国两制’一步步从构想变成现实的过程，我觉得很高兴、很踏实，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



安子介向李瑞环赠书

最佳的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

1982年，阔别故园34载的安子介，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邀请访问北京，当时，中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正在高层进行而没有公开，赵紫阳此次邀请安子介等香港知名人士访问，意在征求香港人士的意见，安子介直陈己见：中英谈判应以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为大前提。“一国两制”一定要落实，97后香港的行政长官一定要按照本地的资本主义方式办事。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好好珍重在香港的资金及外资可以流到这里的环境；第二，要奖励大量就业的工业；第三，留住能为“晋”用的“楚”才。

1984年5月召开的全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了1997年收回香港、对香港采取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的特殊政策。5月21日，安子介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就香港同胞关心的问题发言。他建议，为了保持今后香港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地位，建议确定英语也是法定语言，与中文并用，这有利于促进国际人士增加在香港投资的信心，这对于我们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有它积极的作用。对于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问题，他提出了十六条建议，他的主要意见是：为了稳

定，必须做到以下八个方面——没有持续性的不良治安、没有严重的交通停顿情况、没有此起彼伏的罢工和罢课、没有物价的突然全面上涨、没有骚动抢购和乘乱打劫、没有公用事业的全面停顿、没有煽动骚乱的宣传、没有排外行动、没有严重的恐慌、没有金融风潮等；为了繁荣，必须做到——出口订单无大量下降、生活指数稳定或微涨、无生活资料长期缺乏情况、劳务就业无下降趋势、大中小企业纳税后有结余无大数亏损、工资稳定逐年增加、投资于生产的资产的持续累积和生产设备有所更新、随着世界潮流有新工业产生等。

1985年7月，全国人大聘请安子介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12月，在香港各界人士的一致举荐之下，安子介又担任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

安子介在开展咨询工作时，坚持只带耳朵——“有闻必录”的工作方式，咨询委员会共整理出400多份意见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广大港人的意见。

作为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在咨询会上坚持不掺杂个人意见，不发表个人意见，但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安子介对各项争论和意见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取

向。在最敏感而意见最集中的政制问题上，安子介主张以政治的稳定来确保经济的繁荣，他经常以自己数十年来在香港从事工业和参政的经验确信，香港近二十年的发展与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最重要的不是立法机关中有多少席直选的议员，而在于如何保证社会的安定，对于香港来说，只有安定才是与繁荣相连的。安子介认为，在经历主权移交这一重大变化中力求政治和社会稳定，是符合港人的根本利益的。

安子介领导的咨询委员会及各专题小组开了七十三次会，完成了多份咨询报告，在《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和《基本法草稿》两稿的修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咨询委员会修改了130多处。

起草基本法，有时为了一个字，会争得面红耳赤，安子介这样的儒雅之士，有时也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安子介清楚，中央在基本法的起草中，充分尊重港人的意见。1988年7月，在基本法工作进入最紧张阶段，安子介因肺炎引发心脏功能趋弱，入院做了“搭桥”手术。在病榻上，安子介依然不忘基本法起草的工作进度，亲自起草邀请函，请内地委员来香港交流。他在医院仅休息了一个月，又投入了工作。

经过4年又8个月，基本法起草工作宣告完成。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讨论审查后，未改一字投票通过了基本法。安子介对基本法有质朴而富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比喻，他说：“中国传统太极，一边白，一边黑，但白中有黑，黑中有白，中间又不是一条对抗的直线，而是一条半进半退的弧线。‘一国两制’就如太极图，在统一的国家里面，可以容许两种不同的制度，可以互谅互让。”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完成使命后，安子介参

与发起成立了以诗会友、联谊性质的“香草社”，名取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出版了《香草诗词》一册。又成立了以在香港的咨询委员会为主干，包括中外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性的“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由安子介任理事会会长，梁振英任秘书长，致力于研究《基本法》，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不谈政治”，安子介很有分寸感，他说：“只谈诗，不谈政治，只谈经济文化，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意愿已经完美地凝固在基本法中了。

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工作安子介更是一件也没有少参与，而且都担当了重要职责，他是港事顾问，港英当局单方面撕毁协议，破坏“直通车”安排后，中方被迫另起炉灶，安子介又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顺利选出了立下汗马功劳。

在1993年的全国八届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安子介与霍英东、马万祺代表港澳方面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

安子介与夫人叶纫荃结婚53年，感情甚笃，1987年8月15日，夫人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安子介十分悲痛，夫人生前看中深圳大鹏湾的地势，要求去逝后在那儿购一块墓地，叶落归根，安子介还了夫人的心愿，在夫人落葬时，他把自己的著作放进墓穴，书的扉页写着“献给夫人”四个字。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英两国举行香港交接仪式，安子介作为中国政府中央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的中方席位就坐。是啊，历史当然会给安子介显著的位置。

(责任编辑:刘文)



安子介与夫人叶纫荃在华盛顿

作者更正并道歉

《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刊登我写的《张子善被处决前的悔恨》一文，谈到1951年夏张子善在北戴河西餐厅用餐，赵玉秀在场。实际赵玉秀同志未参加，是我记忆有误。文中说，“张的小姨子在天津”。是以讹传讹，实际张子善没有小姨子。以上是我的差错，特予更正，并向赵玉秀同志赔礼道歉。

范玉崑

国民党名市长吴国桢

● 孙宅巍

吴国桢是民国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汉口、重庆、上海三大市的市长，甚得蒋介石、宋美龄之宠幸。50年代，因与蒋氏父子有矛盾，被迫离台赴美，继而又与台湾当局隔洋舌战。吴氏晚年关注大陆的改革开放，就在他正准备返回阔别35载的故土的时候，却溘然长逝于美国大西洋边的小城萨凡纳。

**任汉口市市长，临去
防洪大堤前嘱咐夫人，
你若听到礼拜堂的钟
声，说明张公堤已破，
我与堤同去了。**

1932年秋，蒋介石在汉口召见吴国桢，决定派他出任汉口市市长。

吴氏上任后，勤于市政建设，将前已初具规模的中山公园加以扩建。大门仿英国白金汉宫式样锻制，富丽堂皇，内设运动场、游泳池和动物园，是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公园。

吴国桢还下力气整修了汉口的下水道工程。工程耗费巨大，且全部工程尽在地下，成绩不为人见，故当市长者多不愿为之。

一日，蒋介石召吴查询市政工程，吴详告以改造下水道的计划。

蒋笑问：“你说得好，如何证明你在执行此政策？”

吴不慌不忙，铺开修建汉口下水道的图样。蒋介石审视后，连声说：“好，好。”

当天下午，吴国桢得到报告，说蒋介石到下水道施工地点进行考查，并详细询问了施工情况。幸而吴国桢对下水道工程的进度抓得扎实，才没有露丑。

吴国桢在汉口市市长任内最重要的政绩，是防洪抢险。1934年夏，武汉地区阴雨连绵，襄河、汉水、长江水位大涨，张公堤危急。该堤一破，整个汉口地区8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将不保。身为市长的吴国桢，亲率军民人等，终日奋战在大堤上。据吴夫人介绍：“国桢坐守在堤上，食在堤上，睡在堤上，国桢还告诉我：你若听到礼拜堂钟声，你就知道张公堤已破，你赶快抱二女儿上楼。”意即自己已与堤同去。其言甚为悲壮。

1938年春节前夕，日军已逼近武汉，武汉城内人心惶惶。当时在汉口市政府担任公职的吴之堂弟国干，向其请假送家眷到宜昌。吴

国桢说：“我的家眷都还未走，你不能在民众未走前先走！”吴国干继而转向秘书长范实请假，言明到宜昌后即回汉口，吴国干到宜后因无船延误了归期。吴国桢知道后，即以“擅离职守”之咎，将其除名，不发遣散费。

这年6月，日军兵分5路进攻武汉。吴国桢让夫人带4个子女随岳父母去昆明，自己独留汉口，组织支援前线和民众撤退工作，他一直坚持到10月24日蒋介石下达总撤退令时，方随军撤离汉口。

就在这大武汉即将失陷、兵荒马乱的时候，吴国桢忽接南开老同学、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电话：“峙之，我带一位客人来吃午饭，可以吗？”

“欢迎。”吴礼貌地回答。

到了中午，吴国桢听到门铃响，亲自开门。见周恩来果然带来一位年过半百的客人。那人身材较矮，穿一身布衣布裤，像似一位乡下老者。

机灵的吴国桢虽与来人不曾相识，但他凭借自己的观察和判断，便

伸过手去，向来客说：“朱总司令，欢迎，欢迎！”

周恩来笑着说：“这就用不着我介绍了。”

席间，吴国桢与周恩来、朱德，谈笑甚欢，饭毕，朱德告辞，周恩来说：“我现在要送总司令走，我晚上还要带一瓶香槟酒来。”

吴笑答：“好，好，也许今日的晚餐，是我们在此地聚餐的最后一次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果然带来一瓶香槟酒，一面请佣人开启，一面说：“我特别到法租界去买的，作为今日庆祝之用。”

“庆祝？有什么事庆祝？”吴不解地问。

“你真糊涂，忘了你自己的生日。”周大笑。

“啊，”吴方醒悟，暗暗钦佩周恩来处事精细。

周恩来告辞后，吴国桢于25日凌晨撤离汉口。

任重庆市长，因防空隧道大惨案的发生，被“革职留任”，遭受到官场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939年12月，吴国桢被委为战时首都重庆市市长。1940年9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重庆为陪都。这样，吴国桢便成了陪都的第一任市长。

吴国桢在就任重庆市长后，主张“以法治的精神，推进民治的市政”，提出了“三个并重”的施政纲领。即：疏建并重，一方面把没有工作的家属疏散到乡村，减轻市区人口的压力，一面趁着轰炸造成的废墟，拓宽街道，鼓励在新街两旁建造楼房；城乡并重，在整顿、建设老市区的同时，建成了小龙坎、沙坪

坝、磁器口、歌乐山、九龙坡等一批卫星城镇，尽量把工厂设在市郊；心物并重，既注重市容、街道的建设，又发起慰问伤兵和义演、义卖、义赛等项有意义的活动，倡导清廉、节俭的新风尚。

当时的山城重庆，是日本侵略者重点轰炸的目标。大批建筑被毁，人民死伤不可计数。因此，吴国桢在就任市长后，大力管理民防，修建防空洞。他兼任了重庆防空副司令，每次轰炸后，吴国桢便四出巡视，了解灾情。

1941年6月5

日夜，日机分批对重庆实施连续轰炸。聚集在较场口下一条公共防空隧道中的市民，由于空袭持续时间较长，人群拥挤，通风不够，单一出口的大门又紧闭，有上千人被挤压窒息而死。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命吴国桢陪同视察现场。在车内，蒋介石指责他说：“这大隧道管理不好，才出了这样大的事，你是重庆市市长，重庆市出了什么事，都是你的责任！”

次日，《中央日报》的头条新闻便是：

国民政府命令：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重庆市市长吴国桢、防空副司令胡伯翰革职留任。

吴国桢在官场上遭到挫折。他处



吴国桢

之泰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诚恳地表示：

“一事不周，全功尽弃；一人疏忽，全体蒙垢。”

吴以“革职留任”之身，奉召参加蒋介石的一次午餐会。会上蒋向大家：“大隧道死了那么多人，除我已作临时行政处分外，这事应如何办理以恢复人民对战时国都的信心？”

吴国桢进言：“重庆市有什么事发生，我都应该负责，委员长处分我革职留任，极为允当。我希望市内所有防空洞建筑和管理事宜，都划归市府处置，以专责成。”

蒋随即拿起笔写下：“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应由防空司令部划归市政府掌管。”

吴国桢在困难当头敢于揽下这副艰难沉重的担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吴国桢对工作的态度和对事业的追求。



吴国桢夫妇在台湾

任上海市长，与前来“督导”经济管制的太子蒋经国貌合神离，种下了日后与蒋氏父子矛盾的种子。

1946年5月，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中心，其时，正是国民党的统治走向崩溃的时期，吴国桢面临着来自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危机的冲击。

1948年初，上海学生继“五·二〇”运动之后，再次掀起反迫害、争民主的大规模斗争浪潮。同济大学学生为反对校方开除学生，决定自1月18日起无限期罢课，

开展绝食活动，并准备于29日赴南京请愿。29日，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20余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前来声援同济学生赴京请愿的行动。吴国桢一面竭力阻止学生的罢课、请愿行动，一面又对学生的行动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据吴夫人黄卓群回忆：当时在现场的吴国桢，帽子甩了，眼镜砸了，烟斗也断了。但吴仍告诫随员：“不能随便开枪。”第二天，上海报纸出现“市长帽子飞了，眼镜砸了”的大字标题。商家也趁机大做广告，给吴国桢送帽子，送眼镜，送烟斗，其中一家帽子公司送去10顶帽子，一家眼镜厂送去新配眼镜2副。

蒋介石于31日命令吴国桢将同济大学解散。吴则故意拖延，未予执行。蒋指责吴：“姑息养奸，以贻后患。”吴国桢电复称：“若31日

果下解散令，军警力量必胶着于同济，社局捣毁（指舞女到社会局请愿事件）、申新工潮（指申新九厂工人罢工事件），将无力处理，而事态演变实有不堪设想者。”他把蒋介石解散同济大学的命令搪塞了过去，避免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发生。

同年8月19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实施“限价”政策。并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管制区的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实际负主要责任。

吴得知币制改革的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给蒋介石通了密电，陈述了个人的反对意见。蒋复电吴：“火速来京。”

吴国桢在面见蒋介石时，坦陈自己的观点：经济问题只能以经济手段去解决；用政治高压，是绝对行不通的。他说：“我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否则撤换我上海市长的职务，借以维持政府的威信。”

可是，蒋介石既不收回成命，也不同意吴的辞职，而是双方约法三章：上海市政府尽量和蒋经国合作，吴本人不负成败之责。

蒋经国初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决心很大，扬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等人被处死；一时间，因经济犯罪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名。可是，当打击的矛头触及“四大家族”时，便遇到了麻烦。

在赫赫有名的孔记扬子公司被查封后，紧急电话直通蒋介石官邸。当时，蒋正在北平指挥军事，遂给吴国桢发去电报，命吴接办扬子公司案，并“立即复命”。

吴国桢故意拖着不办。他在晚年向著名作家江南解释：“我一开

始就向蒋先生表示，不过问经济管制这件事。现在要把这个烫手的蕃薯突然交给我，岂不是要教我难做人！”他还曾向江南先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使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更何况，扬子公司案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不了了之，孔令侃安全无恙，上海市民讥笑蒋经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飞往杭州。吴国桢赶往杭州见蒋，提出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蒋未允。

两三个月过去，国民党政权已是岌岌可危，1949年5月15日这一天，吴国桢夫妇在解放军围攻上海的隆隆炮声中，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

移居美国，关注大陆改革开放，称赞“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扭转乾坤之事”，毅然决定回国观光。

吴国桢在台湾，先后任省政府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常委等要职，但因和蒋氏父子矛盾日深，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职，于1952年5月偕夫人黄卓群赴美。1954年2月，吴便向美国多家新闻媒体发表谈话，公开暴露了与台湾当局在政治上的分歧；同时，他又趁台湾当局召开“国民大会”之机，寄发《上国民大会书》，严厉批评台湾当局“一党专政”、“特务横行”、“思想控制”、“言论不自由”等。3月，吴国桢被台湾当局明令“撤职查办”、开除党籍。从此，他不得不长期流亡海外。

吴国桢在美国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著书立说，其英文史学著作《中国传统》和英文小说《永静

巷》，曾风行美国。

经过巨大创痛的吴国桢，在对以往深沉的反思中，密切注视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历史和现实又把他的思想和心态，推向同新中国人民政权接近。

1982年冬，吴的长婿俞益元从中国大陆带回一张吴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结拜兄弟的照片。吴见此67年前之珍贵照片，一时百感交集，回顾与亡友之交谊，信手题词：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乃异主。
龙腾虎变，风雨同舟。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吴国桢于次年2月将照片、题词寄赠南开老同学、前天津市长、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先生，并致杜一封怀旧、思乡、情深意切的信。此信经邓颖超、廖承志阅后，遂由廖承志副委员长出面，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

吴国桢获此信息，感动不已，乃派其长子吴修广夫妇先到大陆访问，以为他们夫妇的行止提供依据。他在致杜建时的信中说：

……在此半年间，弟对邓小平先生之措施，无论大小，莫不留心；对于胡、赵二位之党正报告，亦曾字字诵读。……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既周且彻，一代坚持，一代继行，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二十一世纪中世界上最强富康乐之一国。弟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

吴国桢并怀着极大兴趣，认真阅读了杜建时寄赠的《邓小平文选》，称邓为“扭转乾坤之人”。他在1983年11月12日致杜建时的信中写道：

……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扭转乾坤之事。就历史言，能成此种

大事者，须具两条件：一要先见得到；二要后做得到。弟读文选完，已知其先能见得到。再由个人向来做事精神推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则何事难成之有！弟不禁为国家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也。……

吴国桢儿、媳吴修广夫妇于1983年底、1984年初赴大陆讲学、观光，受到中共与政府的热情接待。不久，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联名邀吴国桢夫妇携子女回国观光。吴国桢在1984年2月23日复信杜建时说：

……修广夫妇归后，盛称祖国进步状况，及其接获隆重招待情形，不胜感慰。顷又得来函，示知邓颖超主席与杨静仁部长殷勤邀请，回国观光。邓主席更嘱带儿女同来，以利随侍。雅意深情，衷心铭感，弟虽已八十，尚称顽健，惟内子身体素弱，对于万里飞行，未免心怯。且近患骨脊炎及胃病，延医诊治，稍见效果，一时更不敢远离医生。请代向邓主席及杨部长敬致谢忱。……

吴国桢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所受感动，已尽跃然纸上，只是因夫人黄卓群的健康原因，而不能立即成行。并表示争取新中国国庆大典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前抵达北京。可惜，命运之神没有允许这位在海外飘泊了31年的游子回到故土。1984年6月6日清晨在寓所溘然长逝。

我国《人民日报》报道了吴国桢逝世的消息。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发去唁电：

惊悉吴国桢先生不幸逝世，特向你们全家表示哀悼和慰问，盼节哀、保重。

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亦致电哀悼这位30多年前的旧上海市市长。

（孙宅巍：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陆迈）

战火中驻使阿富汗

● 马行汉

我已过古稀之年，五十年代初进入外交部后不久，即与阿富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经历了阿富汗的太平盛世，中阿友好关系的鼎盛时期，中阿两国元首、政府首脑的互访，文化、经济等代表团的互访，虽然工作繁忙，但心情是愉快的；我也经历了阿富汗炮火硝烟的岁月（七十年代未曾任使馆代办）。在阿富汗政局动荡，政变迭起和苏军入侵的日子里，我同使馆其他同志一样，面临生死考验，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坚守岗位，坚持工作。不管炮火连天，枪声不绝，使馆人员不分昼夜地听广播、看电视，千方百计地同当地官员和使团接触，以便了解情况，及时研究并向国内报告。我亲身遇到的这类事件，时间虽过去多年，当时隆隆的坦克声，激烈的枪炮声，时时仍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仿佛刚刚发生在我身旁。

使馆围墙遭炮弹袭击

1978年4月，阿富汗的新年（3月21日）过去不久，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使馆院内的桃花、杏花、苹果花和丁香花争相开放，满园春色。给我们在使馆工作的同志带来了舒适的环境。喀布尔海拔1800公尺，气候宜人，冬天雪大但不太冷，夏天日照时间长，也不太热。它的雪山、草地和湛蓝的天空令人难忘。就是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阿富汗的亲苏军官于4月27日发动政变，激烈的枪炮声把人们从甜蜜的睡梦中惊醒。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处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中心，与阿富汗总统府（原为阿富汗王宫）仅一墙之隔。总统府是反政府武装攻击的中心，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也首当其冲。炮弹在使馆周围爆炸，枪弹像雨点一样击中墙壁和窗户。其中一枚重磅炮弹正好落在我国使馆围墙外十余米处，炮弹片将围墙打了一个大洞，将紧靠墙房间内的一位熟睡的商务官员从床上震到地面，万幸的是，该同志仅受了一点轻伤，使馆的其他同志均安全无恙。

政变发生时，我国驻阿使馆的主要外交官正在阿富汗南方旅行。阿富汗总统达乌德对这次政变感到很突然。当日上午一个中队的坦克从驻地 toward 喀布尔进发时，达乌德总统和阿富汗国防部长拉索里才感到事态严重，匆忙组织反政变行动，但已来不及了。坦克部队抢占电台、国防部、内务部，包围了总统府。达乌德拒不投降，并打死了前来劝降的反政府军官。反政府军队冲入地下室，乱枪齐发，打死了达乌德一家30余口（包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纳伊姆等），这次政变以达乌德惨死告终。

在使馆院内跑步 也惊动阿当局

70年代末期，是阿富汗政局的多事之秋。1978年4月达乌德政府被亲苏军官推翻后，新上台的塔拉基政府并不巩固，统治集团发生激烈的争权斗争。至同年9月间，当时的

阿富汗头号领导人塔拉基同掌握军权的总理阿明之间的矛盾已达到白热化，使苏联感到它所控制的阿富汗这块战略要地有些不稳，企图废掉阿明，以加强塔拉基的地位，从而巩固对阿富汗的控制。苏联领导人利用塔拉基出访古巴路过苏联之机同塔拉基密谋。这些情况被阿明获悉，阿明立即作出应变准备，并打算先发制人，把塔拉基干掉。

9月14日，羽毛丰满、军权在握的阿明解除了亲塔拉基派三个部长的职，并不顾塔拉基的反对，擅自公布这项改组内阁的消息。9月14日下午塔拉基亲自打电话要阿明到总统府办公室“商谈工作”。阿明知道其中有诈，拒绝赴会。只是在苏联驻阿大使通过电话保证其人身安全后，阿明才同意前往。当时阿明带着8个卫士前往赴会。一进门，塔拉基的警卫就开了火，阿明的8个警卫通通被打死，阿明只身逃回国防部，立即以国防部长身分，组织和调遣部队攻打总统府。在战斗中，塔拉基受了重伤，经过医生抢救无效，当晚死去。战斗持续到9月15日清晨才告结束。

阿明大功告成后于16日同苏联大使“磋商”了两个多小时，16日喀布尔电台发表了一条消息称：塔拉基由于健康原因辞职，由阿明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明登台后，苏联出于无奈只得承认这个原先想除掉、而现在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阿明政权。塔拉基之死是掩盖不住的，至1979年10月10日阿富汗报纸才发表了一则很短的消息称：“前

革命委员会主席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久病之后于昨日清晨病重去世。死者的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

就在塔拉基同阿明为争权发生枪战的那几天中，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又经受了一场战火洗礼。我馆同总统府仅一墙之隔，9月14日下午和晚上的那场枪战清晰可闻，枪声像炒豆子般的密集，笔者当时正在使馆赶写一篇文章，闻枪声后忙至院内观察，有的同志还登上楼顶平台观察。夜空中的弹道光呈玫瑰色，双方火力交织在总统府内的一座小楼附近，阿方称之为“花宫”的上空。

就在阿富汗总统府枪战后的第二天晚上，距离我使馆仅100米的阿富汗外交部大楼内灯火通明，从我使馆楼上窗户就可看见阿外交部楼内人们的紧张情况。他们在楼内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好像在搬运什么文件。据后来了解，始得知是阿明命令其部下将有关塔拉基在外交活动中的谈话和资料等文件通通予以封存，并运至某个地方，以消除塔拉基的影响。

在这次争权斗争中，当时对中国怀有敌意的阿富汗政府对我国驻阿使馆戒备森严，他们在我使馆墙外修建了望哨所，监视我馆内的活



战火中的喀布尔曼旺大街

动。出于安全考虑,我们驻阿富汗使馆工作的同志是不能随意上街的,如需要出去从事购物等活动,也要二人同行,以防不测。所以在工作之余,或在饭后的休息时间里,除了球类活动和种菜之外,只能在院内散步、跑步,以保持身体健康。经过阴谋登台的阿明政权,如惊弓之鸟,神经分外紧张。他们对我馆同志按惯例早晚在使馆院内散步、跑步的活动也横加干涉。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阿富汗外交部礼宾司突然打电话给我驻阿使馆称,请中国使馆的先生们不要在院内进行“军事巡逻和操练”,说对中国使馆的安全,阿富汗政府是会注意的。对这次不伦不类的电话,我们真是哭笑不得。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武官处只有一个武官和二名翻译,哪里有什么军事操练?更无巡逻可言。经过仔细分析,可能阿方把我们的跑步、散步等活动误解为巡逻和军事操练了。

苏联入侵阿富汗, 使馆办公楼变战壕

在苏联1979年冬军事入侵阿富汗前后的日子里,中国驻阿富汗使馆的同志们(当时笔者还在使馆工作)面临的险情可算是中阿两国建交后最严重的一次。

自从塔拉基发动军事政变,把坚持中立、不结盟政策的达乌德政府赶下台后,阿富汗人民纷纷成立了各种反政府武装组织,向亲苏的阿富汗政府发起了圣战,起初他们在喀布尔市内进行游击活动,放置定时炸弹,投掷手榴弹,袭击亲苏的党政官员。阿明于1979年9月上台后,阿富汗国内局势更趋动荡,反政府武装发展迅猛。在全国28个省中,已有25个省出现了武装斗争,苏联对此很不放心,大大加快了入侵阿富汗的准备工作。从1979年11月初,苏联中亚部队就小规模地进入阿富汗,陆续从阿军手中接替了一些防务,名义上是好让阿军腾出手去镇压起义部队,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入侵阿的重要路线。

在苏联大兵压境,国内又开始有苏联侵略

军的形势下,阿富汗各抵抗组织为了减少损失和伤亡,将主力暂时撤出首都和各大城市,他们从首都郊区向市内发射火箭炮弹,打击亲苏的阿明政权。处于首都的各外国驻阿使馆有的也遭到炮击。我国驻阿富汗使馆紧靠阿富汗总统府,很不安全。使馆按照国内指示,采取了一些保卫和安全措施:

1. 将办公楼一层的门窗用沙袋封闭,以防流弹袭击,将二层以上的人员搬至一层办公和住宿,人员均从楼的侧门出入;

2. 在院内的小树林中挖了一个避难地下室,以防楼房被炸毁后,该地下室可作临时办公室和休息室;

3. 储备足够的粮、油(汽油和食用油)、菜、蛋,购置两台发电机、游击队一旦炸毁首都附近的水电站或切断首都电源,使馆可自行发电照明和抽院内井水救急;

4. 精减使馆人员编制,撤退部分人员回国,直到1985年2月15日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后,局势才有所缓和。使馆同志们在这类战壕的办公室内艰苦地度过了好几年头。

最为紧张的是前苏联军队大批入侵阿富汗的前后日子。1979年12月上旬,苏联向阿富汗空运了一个营的兵力,严密控制了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机场;一队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军队源源不断地运至喀布尔。12月24日晚,苏联揭开了大举进攻阿富汗的帷幕,喀布尔上空机声轰鸣,震耳欲聋。25日、26日接连两天,苏联的安-22和安-12运输机昼夜不停地进行运兵和运送武器。据统计,苏联进行了150架次的空运,飞机就在我们使馆上空飞过,嗡嗡嗡……象苍蝇一样,闹得人们无法入睡,苏联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把四、五千人和大批重型装备运进喀布尔。

这些异常状态,使我们意识到阿富汗可能要发生重大事件,就在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的当天下午,我同使馆调研室的一位同志开车上街观察动静。汽车在喀布尔转了一圈,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兵一卒,回馆后观看当晚的电视节目,电视台很异常,不放新闻和歌舞,仅放军乐。当晚十一时许,喀布尔市内突然响起枪

声、炮声和隆隆的坦克声，一直持续到28日凌晨三时许，喀布尔电台突然广播了被当时的阿富汗总统塔拉基和政府总理开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籍、流亡在苏联的阿富汗前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讲话录音，他宣布“美国代理人”阿明已被推翻，并已被处决。卡尔迈勒本人被“任命”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12月28日拂晓，喀布尔街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行人断绝。巨大的苏制坦克隆隆地在街上巡逻，我国使馆门前的坦克巡逻震动得楼房窗户玻璃格格响。苏联战斗机擦着屋顶、树梢呼啸而过，声音震耳欲聋，气氛十分紧张。

苏联的武装入侵阿富汗激怒了阿富汗人民，也激怒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中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及世界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苏联的侵略行为，要求它立即从阿富汗撤军。

经过阿富汗各抵抗组织的浴血反抗和世界各国人民、政府的抗议，至1985年2月15日苏联侵略军不得不全部撤出阿富汗。我们的同志在战壕式的办公室内艰苦度过了几年，后来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但好景不长，1992年4月，阿富汗傀儡政权纳吉布拉的统治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国政权。由于阿富汗抵抗组织各派在组成临时政府问题上分歧很大，斗争激烈，他们彼此间使用重炮轰击，使阿富汗首都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弹痕累累，城市的建筑物上几乎都有枪眼，有的高大建筑物（仅二、三层楼房）只剩下了“骨头架子”，很像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市内停水停电，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甚至人员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得保障。阿富汗人民纷纷外逃，驻阿富汗的各国使馆也先后撤退。我国驻阿富汗使馆人员也按照国内指示，于1993年2月10日全部撤出喀布尔，临行前我们将使馆的楼房和馆内财物（包括汽车、电气设备等）委托给一位阿富汗朋友照管。后来，情况危急，这位阿富汗朋友也逃往国外，我国驻阿富汗使馆成了无人照管的空院

子，听任散兵游勇洗劫。

撤离喀布尔险境

我国驻阿富汗使馆的同志是分两次撤出阿富汗的。我们先撤走8位同志（包括女同志）。当时从首都喀布尔通往邻国的公路已断绝，飞机航班已停止，喀布尔机场被游击队的炮火封锁。经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呼吁，由游击队各派力量组成的阿富汗联合政府（包括反对派力量希克马蒂亚尔派）同意停火，让外国派飞机接走外国驻阿使馆人员。按照国内的指示精神，我驻阿使馆人员决定乘俄国专机撤离。8月28日撤退那天，情况十分危急，阿富汗游击队希克马蒂亚尔言而无信，当3架俄国专机在喀布尔机场降落后，突然向机场发射火箭。正在准备登机的俄国、蒙古、印尼、印度和中国等国的100多外交人员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情况异常危急，一架飞机当即中弹起火，浓烟直冲云霄，共有十几人受伤。我馆5位同志乘坐的第一架飞机也险些被火箭击中，但终于进入跑道，急速升空。送行人员也尽快离开了机场，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撤离行动才告结束。

从1992年11月起，我国驻阿使馆又先后遭到十多枚火箭袭击，三栋楼均受到破坏，人员安全更无保证。1993年2月10日最后的9名留守人员（包括张敏代办）在阿各派激烈战斗的情况下，乘坐阿富汗班机撤到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由我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派汽车接到巴首都伊斯兰堡。

至此，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人员全部撤离。但中阿两国仍保持着外交关系，阿富汗驻中国使馆仍有阿富汗外交官员工作。人们希望有朝一日，阿富汗游击队各派之间和塔里班学生军与反塔里班联盟之间的武装冲突能停止冲突，达成和平谅解，喀布尔和阿全境恢复和平，外国驻阿人员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我国同阿富汗这个友好邻邦的友好关系得以继续。

（责任编辑：吴思）

郑和墓的政治隐秘

● 倪泳 金陵客



郑和

1956年7月14日，南京几个青年游览牛首山时，在弘觉寺塔塔基中偶然发现了地宫，出土了铜器、瓷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其中1件铜鎏金喇嘛塔上刻有铭文：“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佛弟

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根据专家考证确认，弘觉寺地宫是一个融佛教和伊斯兰教丧葬制度为一体的坟墓，出土文物之丰富精美，证明物主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遍查文献史籍却不见太监李福善的记载，李福善究竟是何许人？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

经过长达40年的探索、考证，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工作者终于揭开了弘觉寺地宫之谜——李福善者，郑和也！

郑和先祖赛典赤·赡思丁是元朝声威显赫的功臣，祖父、父亲皆名哈只，意为“巡礼人”，即朝觐过麦加

的人。当朱元璋讨平全国后，于洪武十四年派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当时年仅十岁的郑和被虏获，随军来到南京，由明太祖朱元璋赐给燕王朱棣当侍童，后升为太监。建文元年（1399年）由于郑和跟随朱棣

出征，为朱棣从朱元璋长孙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加上他“长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深得朱棣倚重。”永乐二年正月元旦，“郑和以雄才大略，其靖难之功，远出诸宦者之上，故赐姓郑以外，复选为内官监太监，以示酬劳，时郑和年方三十二岁”。

明成祖朱棣为了宣扬明朝的德政，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顺便也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决定派郑和率舰队远航海外。

年方33岁的郑和奉命“帅舟师使西洋诸国”。在南京龙江宝船厂赶造宝船62艘，“体势巍然，巨无匹敌”，每艘长44丈，宽18丈，“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共统率27800余人，带了大量金银、钱币、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至福建五虎门，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扬帆出航了。这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船队从龙湾（今南京下关）启航，以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等为首的大小船只200余艘，其中大型海船63艘，人员有官校、领军、火长、舵工、班碇手、暹事（译员）、办事、书手、医士、铁锚匠、搭材匠、水手等27550名。这次航行

的经费指定由“龙江关”将本应上交南京各衙门的税款和货物拨给船队。这次所带南方特产很多，如江南丝织品和江西的瓷器，以及兵器、罗盘针、航海图，各种食品、建筑器材等。船队遍历暹罗（今泰国）、爪哇、古里（今印度南部卡利卡特）、天方（在今阿拉伯半岛）等二十国，三年后才回到南京。郑和自己却不幸于1433年3月在古里病逝，终年61岁。

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七次“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维艚挂席，际天而行”、征服万顷洪涛，克服重重险阻，往来于南洋群岛、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海一带。航程总计16万海里，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每到一处，都要宣传明朝的外交政策，赠给礼品，与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还剿灭海盗，扶持弱小，深得当地群众的敬慕，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人们怀念郑和，用“三保”、“三宝”等来作为地名，如印尼的三保垄，马来西亚的三保城，泰国的三保港、三保公庙等，以纪念中国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为何使用李姓，据专家考证，牛首山有明太祖李贤妃墓，李贤妃是回族人，曾摄六官事，郑和原本是穆斯林，他追随回族皇妃，并冒用李姓，希望借此得到荫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史实远不止此。

郑和墓的最早记载，是清康熙二十二年所修的《江宁县志》：“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忠云。宣德初，复命入西洋，卒于古里国，此则赐葬衣冠处也。荫兄之子义，世袭锦衣千户，后遂附焉。”明确指

出了赐葬郑和的地点不是目前位于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而是在牛首山西麓的某个地方；郑义之所以死后附葬于牛首山西麓，是因为他确切地知道其养父郑和的赐葬地点。至于县志中说“此则赐葬衣冠处”，是知道内情的人士有意所为，它和郑和当年死后秘不发丧以及秘密赐葬一样，有着复杂的原因。

为什么像郑和这样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几百年间竟会在死后连准确的埋葬地点都说不清楚？这是有其曲折原因的。

宣德初年，郑和已近晚年，又逢明成祖新近去世，郑和失去了知音和靠山，各方面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一方面面临着宣德皇帝的极端不信任，一方面政敌夏原吉又掌握了实权，夏原吉心狠手辣，毁他的档案，坏他的宝船，企图抹杀郑和几下西洋的功绩。身处逆境之下，郑和去牛首山拜访好友宗谦禅师，并在南京城盖寺庙、立佛像，悄悄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郑和七下西洋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当时已进入夏季，船队又地处热带，郑和遗体不能长时间保存，想载回国安葬已不可能，据史载船队在古里停留了十天，郑和遗体的处理正是在这段时间。古里是一个兼奉佛回两教的国家，郑

和去世后遗体在古里火化是合情合理的，同时印度有个风俗，视动物中的牛为圣兽，这也就是把牛牙、牛角同骨灰、人牙同时埋入地宫的原因。

郑和逝世后，宣德皇帝为借其七下西洋的声威继续派人出使西洋诸国，决定秘不发丧，而是秘密赐葬。弘觉寺塔是由南京内官监内使阮昔于宣德八年（郑和逝世当年），奉命到南京“公干”（即奉圣旨行事）时修建的，宣德十年完工。如果说弘觉寺塔是为了纪念郑和所建，那么弘觉寺塔完工之时，也就是郑和遗骨下葬之日。从弘觉寺地宫的形制特小，以及三设、小银叉、人齿、骨灰等来看，它似乎更像一个坟墓，汉语中“塔”一词来源于梵语（Stupa），原意即为坟墓。

在郑和下西洋五十年后的明孝宗弘治年间，对于郑和下西洋的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明王朝有个“天下以其存亡为轻重”的经济名臣刘大夏，认为下西洋是“弊政”、“得不偿失”，一气之下竟然把有关郑和及其下西洋的全部档案材料，调出来付之一炬。这也是造成数百年来郑和墓葬何处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最重要的原因。

（责任编辑：刘文）



直笔与曲笔

——我们的史学传统

● 官伟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传统”一词似乎成了一些美好事物的专用语，例如艰苦奋斗、英勇顽强、敬老爱幼、讲究礼仪等等，都被说成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而在史学方面，“秉笔直书”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其实，这是很片面的。如果“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

艺术、制度等等”（《词海》语）就叫做传统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既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曲笔欺世的传统。

要承认这一点，是令人不舒服的，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客观冷静地检讨这一现象，对于继往开来，升华我民族素质，开创更好的未来，是很有必要的。

下令把太史公杀了。太史公的弟弟继任太史，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史册上还是郑重地写下：“崔杼弑其君”几个字。崔杼非常恼火，又下令把这位太史杀了。太史公的另一位弟弟继位，还是照实写“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杀了。又一位弟弟继位，还是这样写，崔杼震惊了，没敢再下令杀这位太史。齐国还有位南史氏，也是管历史记载的，他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怕再无人如实记载这一事件，就带上笔和简向宫廷走去，他要继续把“崔杼弑其君”这一史实记录下来，走到半路，听说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春秋左传》在记录这一事件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华词丽句，只是直书其事。然而，却铜浇铁铸般给我们树立了五位史官的光辉形象，他们的浩气磅礴天地，他们的英名流芳万古。鼓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司马迁是这五位史官最杰出的继承者之一。他虽身遭腐刑，想起自己的耻辱，就汗流浃背，痛心疾首，却仍要忍辱负重地活下去，正是为了要把他之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子孙万代。因为历史真实是无价之宝，是哺乳我民

《左传》给我们留下五位光照万代的史官形象

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大臣崔杼因齐庄公与其妻通奸，把齐庄公杀了。齐国的太史公在史册上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不愿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就



司马迁

族发育成长最可宝贵的乳汁。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我们才能通过《吕太后本纪》看到汉家宫廷的黑暗丑恶与残酷的政治阴谋；通过《酷吏列传》看到汉武帝纵容赵禹、张汤等的滥杀无辜；通过《封禅书》看到汉武帝安于方士愚弄的种种丑态；通过《佞幸列传》和《张释之列传》看到汉文帝的伪善与汉景帝的刻薄寡恩。

在司马迁前后，还有董狐、赵盾、韦昭、崔浩等一系列光辉的名字，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处死而“无闻后代”。但正是由于有他们那种“宁为兰摧玉折，不做瓦砾长存”的铮铮铁骨，才构成了我们的民族魂，构成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很遗憾，这从来不是我们唯一的传统。

《春秋》给我们留下了相反的遗产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所说的，自从《春秋》以来，“率由旧章”，“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也就是从《春秋》那个时代开始，我们有了为君为亲“隐讳”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论语》里说的“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句影响千古的话。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也就是说，在做历史记录时，为尊者、长者、亲者说假话，把他们的缺点错误和见不得人的事，统统掩盖起来，正是《春秋》做出的“样板”，立下的“规矩”。

《春秋》是鲁国的国史，对鲁国国君之讳，不胜枚举。

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鲁隐公被杀，《春秋》只记了七个字，曰：“冬十有一月，公薨。”而实际上，其中有许多鲁人羞于启齿的事。

隐公息是惠公小老婆生的儿子，是庶长子，没有资格当太子。惠公给息聚了一位宋国女人，惠公见这女人漂亮，就自己占有了她。惠公与她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桓公（名允）。隐公在名义上把允当作儿子，实际上是他的弟弟。隐公因是庶子，在惠公死后，只能算摄政之君，不算正式国君。大夫羽父有野心，便挑拨隐公杀掉允当正式的国君，由他羽父任太宰。隐公说，由于允年纪小，我才摄政。现在他大了，我准备把国君的位置还给他，我已经在菟裘盖房子，要去养老了。羽父阴谋未成，怕隐公把他的话告诉允，就对允说，隐公要害你。允相信了。羽父便趁隐公祭祀戒斋时，派人把隐公杀了。允即位，就是桓公。《春秋》把这些内容全略掉了。

鲁桓公之死更是鲁国的奇耻大辱。

桓公十八年（前694年），桓公带着妻子文姜去会见齐王，齐王与文姜是兄妹关系，二人早就私通。这次见面，自然又给他们提供了幽会的机会。桓公发现了他们私通的事，骂了文姜。文姜告诉了齐王，齐王大怒，在桓公登车欲走时，派彭生在车上把桓公勒死了。鲁国表现十分窝囊，说：“寡君畏惧君王的威严，不敢安居，去贵国重修旧好。礼仪完成后却没有回来，又没有地方追究责任，在诸侯中造成了不好影响。请求用彭

生以消除影响。”齐国便把彭生当替罪羊给杀了，算作交代。《春秋》对这些丢人的事，一字没提。

闵公之死更是一个典型事件。闵公二年（前660年），《春秋》记曰：“秋八月辛丑，公薨。”又是简简单单七个字。实际上这又是一件腐败加淫乱加政治阴谋的丑恶事件。

鲁庄公的夫人哀姜，长期与共仲（即庆父，鲁国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说）私通。庄公死，按庄公遗嘱，立庄公的私生子般为君。哀姜想立情夫庆父为君，庆父先收买圉人率把般杀了。庆父没有立即当国君，先立哀姜妹妹的儿子开为君，就是闵公。闵公登位不久，就发生闵公的保傅夺取卜齮田地的事件，闵公没有制止。引起卜齮的愤恨。庆父趁机鼓动卜齮把闵公杀了。庄公的弟弟季友带着闵公的弟弟申跑到邾避难，派人回国要求鲁人接纳申为国君。鲁人恨死了庆父，要杀死庆父。庆父与哀姜跑到莒。申回国当了国君，就是僖公。庆父要求允许他流亡国外，季友不许，要追究他的罪行。庆父自杀。齐桓公听说哀姜在鲁国淫乱害国，就把哀姜召回杀了，把尸体送回鲁国，让鲁国陈尸示众。鲁僖公求情把哀姜埋葬了。对鲁国贵族来说，这的确都是些很丢面子的事，所以《春秋》里也就一字不提了。后人是通过左丘明为《春秋》写的传，和司马迁的《史记》才知道这些内幕的。

《春秋》不仅对这些重大丑闻讳莫如深，对于国君的一些小缺点，以及人们对国君的一些完全善意的批评，也滴水不露。可见其“为尊者讳”的深刻程度。

隐公五年春，隐公要到棠去

观鱼。臧僖伯认为国君为玩乐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是不应该的，提意见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才不足以备器用”，国君都不应参与。国君的一行一动，都对老百姓有影响，不能不慎重。“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既行，所以败也！”隐公不听，狡辩说，我是去视察嘛！一定要去。臧僖伯就以有病为由，没跟着去。像这样的事，本来很一般，如能如实记下来，对后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只因为事情涉及国君，而国君是长者、尊者，便一概予以“讳”了。

“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蒙冤千古者屡见不鲜

像《春秋》那样只是“隐讳”还算好的。到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复杂尖锐，以及各政治集团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加剧，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也就成了美化与强化自己，丑化打击乃至消灭对方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许许多多的所谓历史记叙，就更不像话了。

有的“用舍（取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用笔杆子作威作福害人利己）”；有的“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有的“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有的则“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肆无忌惮地颠倒黑白！刘知几把这种人叫做：“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说把他们一律“肆诸市朝（处死后陈尸街头），投界豺虎（扔给野兽吃掉）”才好！

不幸的是，这种“奸贼”与“凶人”历代都有，而且越往后越多！

俗话说：“成者王侯败者贼”。又道是：“历史是胜利者写的”。王朝每一次更迭就吹嘘自己丑化前朝，已成惯例。被推翻的王朝，时间越短，被丑化的越厉害。秦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中国大统一的王朝，废世袭，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秦政成为“万世法”！可以说，没有秦始皇就没有以后的所谓中国。秦朝立国于传统观念极深，复辟力量强大之际，它确有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的一面，秦二世世的确腐败，但比起后世的一些昏君暴君来，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只因其立国时间太短，在汉人的笔下，“暴秦”之声就满天下了。

隋朝和秦朝一样，在我国历史上，都是被称为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辟新历史阶段的王朝。它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两大流域。在文化上使南北合流，做出了可贵的新成就。实行均田制，开凿大运河。大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繁荣的大帝国。但它的命运与秦朝一样短暂，在唐人的笔下，人们多知隋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对隋在开拓疆域（西到且末，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国势号称极盛”，以及在文化上的建树，就很少为人所知了。

刘玄（更始）本是“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的农民起义领袖，东汉史家却“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把刘玄写成“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看”，极其懦弱无能的小人物。

《洛阳伽蓝记》曾引赵逸的话

说：“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还举了苻生的例子。

苻生是十六国时前秦的皇帝，在位第二年被苻坚杀掉。据赵逸考证：“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可是，《晋书苻生传》却说他是个一天不杀人就过不下的极端残暴之君。他杀妻杀太傅杀尚书杀左仆射，又杀丞相及其“九子十二孙”。父亲刚死还没安葬，他就“荒耽淫虐，杀戮无常。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以便随时杀戮。说他一天到晚喝酒，谁说他好，就说人家拍马屁，杀！谁给他提个意见，就说人家诽谤他，杀！他还让宫女和男人在殿前集体性交；还剥掉人的脸皮，令被剥掉脸皮的人给他跳舞取乐！

这跟赵逸说的反差太大了。然而却白纸黑字写在《晋书》和《资治通鉴》中。史书还说他“幼而无赖”，从小就是坏蛋。对同一个人竟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记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想想现实生活中，一些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忽而被说成万恶不赦的内奸叛徒，似乎也就不是那么不可以理解的了。

陈寿是杰出的史学家，不但有一手好文笔，见识也高。然而，只因为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了诸葛亮“于治戎（训练军队）为长，奇谋（出奇制胜）为短；理民之干（统治民众的才干），优于将略（超过军事谋略）。”就闯下了大祸。这本来是很中肯的评论。比《晋书》里司马懿的评论客气多了。然而，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习惯，对于好人只能说好，对

于所谓坏人只能说坏，即所谓“美不加恶，毁不加誉”。否则就会犯众怒。陈寿只因说了上面的话，便横遭诬陷和攻击，而且写进了陈寿传。说陈寿的父亲曾在马谡手下做官，受马谡牵连，被诸葛亮处过髡刑，陈寿是为父报仇才这么说。有的更玄乎，说陈寿曾在诸葛亮手下当书佐，被抽过一百鞭子，为报鞭仇才这么写。实际上，诸葛亮死时，陈寿才两岁。

应该说，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在他校订的《亮集表》里说：“亮科教业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怎么能说他故意贬低诸葛亮呢？我们那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不许说英雄人物一点不足的老习惯是很有害的。

从“子为父隐”到“服从政治需要”

“子为父隐”的伦理观念，产生于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是为稳定小农家庭和封建秩序服务的。小农家庭是农产品的生产单位，也是劳动力的生产单位。“孝”是维系其稳定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子为父隐”，含有孝的意思，被认为对坚持和宣扬“名教”有好处，因而也就成为儒家信守的原则之一。而且推延开来，发展成“为长者讳”“为尊者讳”，它的影响是很深远很有害的。

共产党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是反帝反封建讲

阶级斗争的党。当然不会再搞“子为父隐”那一套。相反，在父子亲友中还要强调阶级斗争，立场观点不同的，要开展坚决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治斗争。因此强调一切服从政治，政治是大局，是全局，一切都要服从政治的需要。

然而，任何真理走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服从政治需要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是必要的正确的，例如说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就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军事斗争本身不是目的，它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当然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但要说一切都要服从政治的需要就值得研究了。

首先，什么叫政治？“三个有利于”是政治，“三面红旗”也是政治。“坚持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政治，搞科学的，搞历史的，应当怎么个服从法呢？

“大炼钢铁”全民上山砍树烧小高炉，搞科研的人，论证这个做法对，炼出的钢铁很有用，叫做“服从”呢？还是论证这个办法不对，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叫做“服从”呢？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是后者而是前者才叫服从。而这样的服从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过来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建国以来，我们的党史改来改去，对陈独秀、瞿秋白乃至刘少奇、彭德怀包括对抗战时期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评价，之所以变来变去，不能不说都与服从一定时期的所谓政治需要

有关。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这样说，乍一看，似乎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其实，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所理应得出的结论。

讲政治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对于搞科研搞历史的来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以科学精神研究问题讲真话，才是真正地讲政治，才能对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起积极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是“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事情。这是不错的。不仅如此，它还是关系培育发扬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关系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探索未来道路的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史学领域，已经出现崇尚实事求是的良好风气。这是我们社会走向成熟，国家将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但旧影响、旧习惯势力依然存在而且顽强。像《洛阳伽蓝记》里说的，一个人只要一死，在讲他一生的时候，“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一个个都成了“尧舜”与“伊、皋”式的伟大人物。《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的作品，一千五百多年过去了，类似的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仍然时有所见时有所闻吗？完全作到“秉笔直书”还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致中)

姓名·家谱·谱牒文化

● 欧远方

中国的姓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旧社会对起名十分严格，在社会交往中，相互的称呼违反了规范，就会引出笑话，甚至把事情搞糟。

过去人际关系呼名唤姓强调长幼有序，在问话前首先要加“请问”二字，以示尊重，问到对方的姓，要说“尊姓”，问名字时，问者文雅点用“台辅”，通俗点问“大名”。过去人在名之外，还要起“字”，文化高的人还起“号”。在“名”与“字”之间有密切联系。要具一定的文化才能取上恰当的“字”。如毛泽东、字润之，李宗仁字德邻，张飞字翼德，诸葛亮字孔明等等，我们还可以看到“泽”与“润”，“仁”与“德”，“飞”与“翼”，“亮”与“孔明”等名和字之间的联系。所以中国人的名与字之间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内涵。以我个人的名字为例，我原名欧元方，字智园，取之于古语“智欲圆而形欲方”。至于号，一般是自己随个人兴趣起的。有许多作家取“笔名”，而且用了一生，原姓名反而鲜为人知了。如鲁迅原名周树人，茅盾原名沈雁冰，冰心原名谢婉莹，老舍原名舒舍予，曹禺原名万家宝等等。

中国人称呼别人姓名只有长辈可喊，一般人之间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称呼对方不论是口头上的，还

是书信往还或书画题签，都只称名而不加姓，加上姓似不礼貌，至少不够亲切，同志间或上下级一般都以只称名而不带姓为最好，如：“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在过去一般有知识的人，或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除“名”外还有“字”。如章士钊，字行严，朋友见面称行严先生或行严老。称先生不仅可对男性，亦可对女性，毛泽东对宋庆龄、何香凝写信均称她们为先生，以示尊重。

不论古今，以最高职务代替名字是常见的。如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后人尊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称杜甫为杜工部，称庾信为庾开府。称鲍照为鲍参军，李白有诗“请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中国人对毛泽东习惯都称毛主席，或简称主席；称周恩来为周总理，或简称总理；称朱德为朱总司令或总司令，唯独对刘少奇始终称“少奇同志”，使人有尊敬和亲切的感觉。直到现在，老同志间仍喜欢称老×，甚至直呼其姓名，彼此不但不见怪，而且觉得亲热。

至于在名字之后加老的称呼，大抵是在名人间，如安徽人称张恺帆为“恺老”，以示尊重，也很亲切。称公也是一种时尚，年纪略大，互称张公、李公也有尊重之意。甚至把名字中一个字称公，如周恩来称张学

良为“汉公”。因张学良字汉卿。

乳名、小名只有父母或长辈喊，民间过去读书少，乳名、小名可以喊到老。中国历史上重男轻女，在名字上也反映出来。女孩子多了，盼望生男，于是把女儿取名“带弟”、“招弟”。五四运动后，为了强调女子的地位，起名“越男”、“超男”之类的也不少，过去中国女的多数只有乳名，而无名字，出嫁后只称姓加上一个“氏”，文书上或墓碑上一般都称“×氏”，或加上丈夫的姓。读书人给女孩起名一般不和男孩一起排辈分，也不能和男孩一样排名次，如兄弟姐妹多人，老大是女的，老二是男的，但习惯常把男的说是老大。新潮还在自己姓名上加上丈夫的姓，如香港知名人士陈方安生。这是吸收了外国习惯。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夫妇隔代同姓。明代湖北麻城人吴万一和妻子张秀英迁移四川犍为，张的弟弟中途病故，为不使张家断了香火，夫妇俩决定其后代一代姓张，一代姓吴，并写入《族谱》，世代相传。

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柏龙驹告诉我：他们柏家和陈姓、戴姓共一个祠堂。原因是南北朝时代，民族大迁徙。北方大名府有三位把兄弟，老大姓柏，老二姓戴，老三姓陈。三位靠卖艺为生，走

到巢湖已穷困潦倒，在岸边村落住下，老大柏和老二戴已过半百，老三陈正当壮年。为传宗接代，三人拼命劳作攒钱为老三陈娶妻，他们三人情同手足，言明第一个男孩过继给老大柏，第二个男孩过继给老二戴，以后生的由老三陈养育。后来子孙繁衍，三姓共建、共祭、共用一个祠堂，因为从血缘关系看，三姓子孙都是陈姓之后，就把陈放在前面。周围乡亲习惯称之为“陈柏戴祠堂，”持续至今。

中国过去还对某些大人物或名人以出生地为名。如袁世凯是河南省项城人，人称“袁项城”，称段其瑞为“段合肥”，称康有为为“康南海”。

还有以排列称呼对方的，唐宋间尤为流行，如李白有诗《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裴是李白朋友。还有《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宋代这样称呼更多，文天祥在一封家书中，称其弟文璧为千二哥。妹妹文懿为百五贤妹。

南宋初几个大将常用称呼来排行，刘世光称刘三，张俊称张七，韩世忠称韩五。排行在各族中序列不一，有的是亲兄弟，有的是叔伯兄弟，甚至在三代四代之间排列的，否则不可能有那样大数字。

还有一种称呼是很特别的，即以其作品中的名篇名句作为雅号。如北宋著名词人秦少游词《满庭芳》中有“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名句，秦少游就有了“山抹微云秦学士”的雅号。著名词人柳永曾当过屯田员外郎，因他的《破阵乐》词中有“露花倒影”名句，人称““露花倒影柳屯田””。

封建社会里，中国人起名字一定要避讳，所起的名字不能与皇帝同字，甚至不能同义、同音，对父辈也是如此，否则就是不忠不孝，甚至引来坐牢或杀身之祸。特别是做了官的，发现有避讳的字就得立即把

名字改掉。最典型的是唐朝大诗人李贺，以他的学问本可以考取进士的，但因父名叫晋肃，“晋肃”与“进士”同音，于是他终生不应进士举。皇帝名讳甚广，不仅人名，地名也要避讳，如宿豫县避唐代宗李豫之讳，改名宿迁县。有人羡慕名人，干脆以名人为名。近现代，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一改过去避讳的陈规，故意把儿女的名字与自己联系起来，如画家傅抱石把儿子取名傅小石。

中国的家族大都有家谱，随着人口的繁衍，一定时期要续家谱，由族中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主持，这样代代相传，形成完整的家庭历史系统，这件事意义很大，不但可以帮助名人寻根，也可以做为研究人口繁衍迁徙、自然灾害、政治斗争以及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族谱体系，后来族谱学振兴，一族之内都加入了族谱体系，有的可以做到全国统一，如孔家族谱，在全国辈份一点不差。曾子是孔子得意门生，姓曾的也同孔孟一家班辈序列相同。

根据族谱所规定的用字起名，因为它表示辈份，是起名时不可缺少的，通常都放在第二个字（也有放第三个字的，如鲁迅兄弟周作人、周树人、周建人）。一般都要取积极含义的字。反映道德内涵的，如忠、孝、仁、义、信、礼、德之类，反映吉利内涵的，如福、禄、寿、喜、财之类，或反映志向的内涵，如文、武、斌、国、建之类。还有其它美好字眼，如金、银、宝、玉、松、柏、龙、马等。辈份的重要性不仅仅可以维持长幼有序，而且由于有“同族不婚”的纪律（社会公认）因而可以避免近亲通婚，对提高人的素质也极有好处。

由于“族谱”或“家谱”的产生，于是出现了族谱学，“谱牒文化”。山西省社科院“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李吉教授说：谱牒文化是蕴藏宏富、亟待开发的丰厚遗产，它是人类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庭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藉，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以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蕴含有大量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经济学、伦理学、经学、哲学及人物传记和地方史料，其数量之巨大，内涵之丰富，不亚于正史、方志，因此与正史、方志被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

可见谱牒文化的重要了。

当代国内外都掀起了寻“根”热，海外华人到祖国寻根的就多了，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根据族谱知道自己祖籍是广东潮州人，原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根据族谱，确认自己为福建马尾鸿渐村的女儿。1994年9月30日，马来西亚华人，香港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先生到太原寻“根”，经“研究中心”仔细查证，确认郭鹤年先生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嫡传后裔，郭甚为高兴，当即和山西矿物局签订了合资经营太原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合同。前些年，我们安徽从包拯家谱中查到香港船王包玉刚是包公后代，包玉刚夫妇专程来到安徽合肥瞻仰包公祠，并投资建立一所医院。去年四月，毛泽东之女李纳专程到云南寻“根”，得知毛家远祖是江西吉水，毛氏始祖毛太华随朱元璋大将蓝玉、沐英出征云南有功，遂落户云南，后又有一支迁移湖南，毛泽东是毛太华第20代孙。前几年，从族谱查出邓小平原籍江西吉安。山西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现在已成为全国研究家谱的名副其实的研究中心了，这里已经收藏家谱、族谱3000多部，著录姓氏270多个，涉及全国除台湾、新疆、西藏等以外的所有省份。现在家谱、族谱在研究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已日益显示出来。

（责任编辑：仲文）

炎黄春秋



费孝通在四川凉山采风



韦君宜（右）和她的弟妹们

读韦君宜《思痛录》

北大的校格与蔡元培的人格

战火中驻使阿富汗

保卫四平之战

君子章乃器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